臺大歷史學報第48期
2011年12月，頁1-49

BIBLID1012-8514(2011)48p.1-49
2010.11.17收稿，2011.12.27通過刊登

談泛臺灣客家認同
——1860-1980 年代臺灣「客家」族群的塑造

陳　麗　華*

提　要

在今天的臺灣社會，很多人都認同自己是客家人，也相信「客家」族群的存在由來已久。然而，當代社會學家指出，臺灣客家認同的興起，實際上是 1980 年代以後一系列客家運動的產物，是一種現代政治環境下嶄新的族群想像。研究者也指出，清初至 1980 年代以前，臺灣社會形塑一種「泛臺灣客家認同」，此論點十分具有啟發性，但筆者懷疑，這一概念可能過度化約了歷史，它一方面忽視了「泛臺灣客家認同」和現代族群想像之間可能存在的關聯機制，另一方面也混淆了前近代至當代人群分類觀念的差異。因此，本文試圖探究十九世紀後期至客家運動興起以前，「客家」族群觀念移植臺灣並逐漸為地方人士所接受的過程，以便為「泛臺灣客家認同」的討論注入歷史根基。

本研究發現，「客家」觀念並非源生於臺灣社會，而是十九世紀下半葉以來，隨著臺灣開港，由西方人從東南亞和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移入。其後，日本殖民者用籍貫的「廣東」取代了「客家」，作為該種族的名稱，儘管它包羅的範圍與我們今日所界定的「客家」有所不同，但日治時期日本及臺灣知識階層在身分、文化與社會結構上，對客家族群的塑造卻影響深遠。日治中期以後，臺灣客家菁英對於這一身分的認識，顯示出在不同的政治和社會背景下，中國大陸之民族主義與殖民主義交織的影響。戰後初期，隨著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具有客家意識的中國大陸客家知識階層，以及崛起於日治時期並受到近代中國民族主義思潮影響的知識菁英，推動了「客家」觀念與「廣東種族」的融合，並逐漸向臺灣地方社會滲透。「泛臺灣客家認同」，正是於此一歷史演變過程中形成。

關鍵詞：臺灣　客家　泛臺灣客家認同　族群　知識階層

* 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30013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101 號；E-mail: lhchen101@gmail.co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引言
二、「客家」種族觀念的傳入
三、「廣東」種族下的客家塑造
四、民族主義還是殖民主義？
五、戰爭下的民族建構
六、民族國家內客家觀念的散播
七、結論

一、引言

幾年前，筆者在臺灣田野調查期間，曾有幸親身觀察和體驗北部桃竹苗和南部六堆兩大客家聚居區族群意識的高漲。2005 年，我參加了新竹新埔鎮義民廟的祭典活動，清末以來，這一活動便以隆重盛大著稱。主祭當日，四面八方湧來的觀光客、文史工作者及記者，連同舉著黑令旗的各地信眾，如潮水般湧入廟中，碩大的神豬、神羊在場內一字排開，廟內外氣氛熱烈到了極點。2006 年，我也參與了南部六堆地區信仰中心忠義祠舉辦的秋祭及繞境活動。載有六堆忠勇公牌位的神轎、各鄉鎮的花車以及信眾的私家車，浩浩蕩蕩穿梭在各鄉鎮間，不止地方政府、學校學生都被動員起來，地方民眾也擺起香案拈香拜祭。這一時期也正是臺灣社會客家族群運動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所到之處，均會聽到當地人很自然地談起「我們客家人……」，顯示在當下的臺灣社會，「客家」族群認同已經具有廣泛的基礎。

對於臺灣社會客家族群意識的興起，社會學家王甫昌已進行頗為精彩的解釋。他認為「客家」族群認同是一種現代性的「想像」，是 1980 年代後期開始的客家社會運動動員的結果，這種想像所預設的人群之間的關係，是以現代國家的公民權利為前提，而一些客家文化運動的訴求背後，實際上是針對臺灣走向民主化與本土化之後，來自強勢閩南文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壓力。[1]不過，他並沒有否認在此之前客家認同已經建立某種程度的歷史基礎，他將之稱為「泛臺灣客家認同」：

> 所謂的「泛臺灣客家認同」，是三百年前左右移入臺灣的客家人之後代，在臺灣社會中的歷史經驗（經過清朝、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以及當代的特殊需求與壓力之下，發展出來的新的族群想像，它不僅與現在中國大陸原鄉的客家人的認同不同，也和戰後由大陸各省移入臺灣的「大陸客家人」不同。[2]

為了賦予這一概念實質的意義，王甫昌以義民信仰為例，探討它成為臺灣客家認同中重要符號的原因。在他看來，由於清代臺灣社會的閩客之分涇渭分明，義民成為雙方對立情緒下客家人強調的對象，閩人則刻意將之遺忘。

王甫昌的論述，強調客家人在臺灣獨特的歷史經驗，深具啟發意義。然而，筆者認為有幾點必須進一步推敲和商榷。首先，王氏似乎假定臺灣社會一直以來都有「客家人」，然而，如果我們回到清代，便會發現當時的歷史名詞和這一具有本質論傾向的族稱之間，差異頗大。我們知道，清政府沿用的是明代以來里甲式編戶齊民的管理辦法，以籍貫區分人群，由於臺灣移民主要來自地理位置相近的閩粵兩省，臺灣的漢人遂被區分為兩大類——「閩人」和「粵人」。清代閩人常指粵人為客，因為涉及土地拓墾及參加科舉考試的權利，至於閩粵雙方講什麼語言，風俗習慣有何不同，政府很少關心。[3]不過，孔邁隆（Myron L. Cohen）的研究提醒我們，語言差異對於華南地方社會組織方式的影響也非常重

1 王甫昌，《當代臺灣社會的族群想像》（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3），頁 133-145。

2 王甫昌，《當代臺灣社會的族群想像》，頁 121-122。

3 能否參加科舉考試，和是否有「籍」關係密切。在科舉學額的爭奪上，乾隆年間，臺灣便制定「粵籍」學額的規則，並於道光年間設立「粵籍」舉額。這不僅讓粵人在閩籍佔多數的環境中擁有保障名額，也杜絕閩人攻擊粵人佔額的藉口。正如李文良對學額制定過程之研究，強調粵民必須通過強調祖籍認同，才能在閩省所轄的臺灣府參加粵籍的科舉考試。參見李文良，《清代南臺灣的移墾與「客家」社會（1680-179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頁 229-26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要。[4]在臺灣南部，講閩南話的群體便常自稱「土人」，而講客家話的群體被稱為「客人」，由於省籍和語群的邊界不一致，使得歷史上人群指稱實質上有很大的不確定性。而就「客家」一詞本身而言，它根本不是臺灣社會閩南話環境中習用的詞彙，而是廣東地區以本地人自居的廣府人對外來者歧視性的稱呼。這個「泛臺灣客家認同」的重要標籤進入臺灣社會的歷史過程，還有待進一步釐清。

其次，「泛臺灣客家認同」作為一種分析概念，也隱含被囊括進這一標籤的人群內部具有均質性。雖然客家人早在清初便已經入墾臺灣，並在南北均形成以義民祭祀的廟宇為核心的兩大聚居區，但將這兩個具有不同內涵的社區塑造為同樣的「客家」族群，同樣需要解釋其機制。今日臺灣南部的客家聚居區六堆，在清代實際上是講客語方言群體的聯盟組織；而北部桃竹苗地區，卻能以幾座義民廟為中心，形成粵籍聯盟，其形成的時間比南部晚，語言分布格局也較南部六堆地區複雜得多。[5]它們之間的連接機制，並非到了王氏所提及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寺廟串聯活動才發生的，因此有必要重新回到歷史尋找其淵源。

由此引發的第三個問題是，所謂「泛臺灣客家認同」是否將近代的發展投射到歷史上的另外一種想像呢？這個概念排除了原鄉和戰後湧入人士的影響，劃定了臺灣的族群邊界，而這個邊界深刻影響地方人士的認同觀念，是近代臺灣進入日治時期（1895-1945）以後才明顯呈現。[6]關於日本政府對殖民地人民種族文化塑造的深遠影響，學者們的關注還遠遠不足。另一方面，臺灣客家認同的衍生，並不意味著閉門造車，相反的，種種證據表明，中國大陸伴隨民族主義發展起來的客家意識，以及日本帝國之下臺灣客家族群意識形態的改變，亦隨著外部政治環境的變化，影響和牽動臺灣社會的族群想像。

---

4 Myron L. Cohen, “The Hakka or ‘Guest People’: Dialect as a Sociocultural Variable in Southeastern China,” *Ethnohistory* 15:3 (1968, Durham), pp. 237-292.

5 吳中杰，〈義民信仰與北臺灣客語分佈格局的形成〉，收入賴澤涵、傅寶玉主編，《義民信仰與客家社會》（臺北：南天書局，2006），頁 229-244。

6 吳密察，〈臺灣史的成立及其課題〉，《當代》第 100 期（1994，臺北），頁 83-8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因此，在王甫昌研究的啟示下，本文希望能夠展示「客家」觀念進入臺灣社會並傳播開來的歷史過程，以及近代以來國家建構過程中的關鍵變化，對於塑造臺灣地方人士身分認同的影響，特別是對扮演關鍵角色且具不同背景的知識階層。筆者相信唯有如此，才能釐清「泛臺灣客家認同」的形成過程，為客家族群認同研究建立更為牢固的歷史基礎。

二、「客家」種族觀念的傳入

清代的臺灣歷史上，到底有沒有「客家人」呢？或者說，今天我們稱為「客家人」群體的祖先們，是否已經有了族群的意識呢？這一問題曾經吸引不少學者的注意。儘管清政府延續的是明代以來里甲編戶的辦法，以閩、粵的籍貫來區分臺灣漢人，在臺灣社會官方和民間留下的文獻中，有關「客」的記載其實不少。李文良對清初歷史變化的研究已經提醒我們，「客民」、「客人」、「客仔」等詞彙，有其獨特的歷史背景與意涵，將之直接理解為語言、文化上同質的客家人，是以今度古的危險做法。[7]

如果我們把視野拉近到臺灣南北兩大客家聚居區的地方社會，也會發現「客」所指稱的群體存在差異。在南部，康熙末年的朱一貴事變之後，不同語言群體的區分變得明顯起來。閩南及粵東潮州一帶講福佬話的群體自認為是「土著」，而閩西、粵東乃至贛南的客語群體則是「客民」，「六堆」便是大量來自廣東梅縣、蕉嶺等地客家話群體組成的地域聯盟組織，位於中堆竹田鄉境內、拜祭義民的忠義亭是其信仰中心，同省的福佬話群體實際上並未囊括在內。這種區隔在官方的記載中，常被簡化成「閩粵分類」。[8]而開發較晚的北部桃竹苗地區，移民來源較南部

7 李文良，《清代南臺灣的移墾與「客家」社會（1680-1790）》，頁 137-142。

8 李文良，《清代南臺灣的移墾與「客家」社會（1680-1790）》，頁 168-170；林正慧，《六堆客家與清代屏東平原》（臺北：曹永和文教基金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更為複雜，來自潮州、惠州府的非客語群體也不少，是各種客家話次方言交錯並用的區域。經過清代長期的地域社會建構，形成了以幾座義民廟為中心的三大祭祀範圍，內部逐漸形成統一的客語次方言，十九世紀中期後形成一個以「粵人」為認同的社會。在這一社會中，省籍差別便常常成為土客區分的標準了。[9]

可以看出，儘管臺灣南北地區各自形成小範圍的我群認同，彼此之間卻缺乏聯結的平臺。他們表達認同的詞彙，往往回到官方常用的籍貫上，無論在官員、士紳留下的文獻中，還是在福佬話環境的語言中，都找不到「客家」的說法。「客家」一詞，是明清以降中國大陸廣東地區廣府話群體對於外來客語群體的稱呼，也含有方言群體區分的意味。實際上，這一詞彙進入臺灣社會的過程，十九世紀以來帶有種族觀念的西方和日本殖民者扮演了關鍵的媒介角色。

十九世紀上半葉，漸次東來並在中國東南沿海一帶活動的西方人，創造了以語言區分為基礎的客家（Hakka）種族觀念。早在 1838 年，曾經以傳教士及東印度公司、英領事館雇員身分在中國東南沿海活躍多年的普魯士人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1803-1851），便提到在東南亞地區的廣東移民中，有一類稱為「Kea-jin」（客人），他們講的方言接近官話，同時也提到他們定居在臺灣島的內陸以及南洋部分地區。[10] Hakka 一詞，則是與廣府話人群密切接觸的西方人，將其對「客家」一稱的發音用英文記錄下來，作為客語群體的族稱。如 1845 年，英國在香港的殖民地官員 Samuel Fearon，便提到香港早期住民中有大量的

司，2008），頁 166-167。

9 羅烈師，〈臺灣客家之形成：以竹塹地區為核心的觀察〉（新竹：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5），頁 223-279。吳中杰，〈義民信仰與北臺灣客語分佈格局的形成〉，收入賴澤涵、傅寶玉主編，《義民信仰與客家社會》，頁 229-244。

10 Charles Gutzlaff; rev. by Andrew Reed,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 Religion,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 p. 132. 有關郭士立與東南亞華人社會接觸的研究，請參見〔日〕飯島典子，〈19 世紀傳教士眼中的「客家人」〉，《客家與多元文化》第 4 期（2008，東京），頁 29-3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客家人（Hakkas，他更將他們類比於吉普賽人），其語言、習俗、個性的不同，使其成為一個特殊的人種（race）。[11]近年來，對於十九世紀西方傳教士如何先透過潮汕話或廈門話認識 Kih、Ka、kea-jin 或 kheh（客）等族群的存在，繼而在鴉片戰爭後透過廣府話認識和定義 Hakka（客家）的過程，施添福已經作了極為細緻的研究和梳理，讀者不妨參閱。[12]

1860 年臺灣開港前後，接踵而至的西方官員、商人、學者及傳教士等，很快亦將 Hakkas 移植到臺灣社會，用來指稱同樣講客家話的人。1864 年，任駐臺領事的郇和（Robert Swinhoe, 1836-1877；或音譯為史溫侯），到恆春海岸一帶調查英國船隻遇難事故時，便曾這樣描述：「從山谷返回平原時，我經過一個村莊，在瑯嶠略南、略西的地方。那裡有客家人（Hakkas）居住，是從廣東省北部移居來的。」[13]郇和曾在英國受過良好教育，大學尚未畢業就考上外交官，被派到中國當翻譯。他對臺灣的生物、植物及人種均有很深的興趣，對於西方人如何分類中國人顯然也非常熟悉，因此立即引進廣東及香港、海峽殖民地等地西人中漸漸流傳的 Hakka 一詞，描述臺灣的客家話群體。[14] 1860-1870 年代以後，越來越多的西方官員、傳教士、學者、商人或冒險家等，與臺灣不同語言群

11 Colonial Office Records（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微縮膠卷）, series 129-12, 24 June, 1845.

12 施添福，〈從「客家」到客家（二）：客家稱謂的出現、傳播與蛻變〉，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第三屆「族群、歷史與地域社會」學術研討會專題演講論文（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主辦，2011）。

13 Robert Swinhoe, “Additional Notes on Formosa,”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10:3 (1865-1866), p. 127. 中文譯本見史溫侯，〈福爾摩沙記行附錄〉，收入費德廉（Douglx Fix）著，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臺灣：十四位西方旅行者的福爾摩沙故事》（臺北：如果出版社，2006），頁 62。

14 1863 年，郇和便成為倫敦人種學學會會員。另外他在臺灣期間，與首位來臺傳教士郭德剛（Fernando Sainz，1859-1869 在臺傳教）接觸頗多，郭氏許多關於臺灣種族的知識，便是得自郇和。費德廉著，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臺灣：十四位西方旅行者的福爾摩沙故事》，頁 14-15；陳政三，《翱翔福爾摩沙：英國外交官郇和晚清臺灣紀行》（臺北：臺灣書房，2008），頁 94-97、16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體有所接觸，Hakka 一詞也日益頻繁地見諸文獻記載。[15]

西方人對於臺灣「客家」的紀錄，多半基於經驗主義的隻言片語，對於臺灣社會內部如何描述與指稱他們，並沒有多少關心。1863 年以海關官員身分來臺，其後從商的必麒麟（William A. Pickering, 1840-1907），可能是十九世紀下半葉對臺灣社會不同語言群體最為了解的西方人之一。[16]他在 1898 年出版的書中，便注意到臺灣社會的用詞實際上和廣東等地並不一致：

> 西部沿岸和從北到南的整個的沖積平原，都由來自中國福建省的移民們居住著，他們說的是歐洲人所謂廈門話的一些變體。除掉廣東北部的潮州人之外，中國其他各省的人完全聽不懂這種話。這些移民叫作「閩南人」。（按：原文為 Hok-los〔福佬〕）
>
> 在較低山脈之間的鄉村，在南角，以及在野人地區之邊界的各處地方，我們都發現另外一個完全不同的民族（distinct race）叫做「客家人」（Hak-kas），或如「閩南人」所稱呼他們的「客人」（Kheh-lang）。這些人是一個很奇特的民族，所說的是中國官話

15 學者們已經對西方人的臺灣論述進行了系統整理，讀者可以從下列書籍中獲得有關客家論述的大致輪廓。Robert Eskildsen ed., Foreign Adventurers and The Aborigines of Southern Taiwan, 1867-1874: Western Sources Related to Japan's 1874 Expedition to Taiwan (Taipei: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2005). 中譯本可參見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臺灣：十四位西方旅行者的福爾摩沙故事》；白尚德，《十九世紀歐洲人在臺灣》（臺北：南天書局，1999）。

16 必麒麟曾多次在島內遊歷，並在 1867 年協助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又譯李讓禮）處理美船羅發號事件，在此前後，兩人留下了不少有關臺灣南端「客家人」的紀錄。James Horn, "Extract form Mr. James Horn's Journey," *The China Mail* (Hong Kong), Dec. 12, 1867, p. 3. 必麒麟（W. A. Pickering）著，吳明遠譯，《老臺灣》（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頁 97-98。《老臺灣》一書譯自 W. A. Pickering, *Pioneering in Formosa: Recollections of Adventures among Mandarins, Wreckers, & Head-hunting Savages: with an Appendix on British Policy and Interests in China and the Far East* (London: Hurst & Blackett, 1898). Robert Eskildsen ed., *Foreign Adventurers and The Aborigines of Southern Taiwan, 1867-1874: Western Sources Related to Japan's 1874 Expedition to Taiwan*, pp. 65-19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的一種。[17]

來臺之前，必麒麟已經懂得某種程度的廈門話及官話，離開臺灣後的1870-1890 年代，更曾長期擔任海峽殖民地的華人護民官。可能正是基於長期與不同語言群體的華人打交道的經驗，因此他能清楚地指出廣東的潮州人與福建的福佬人語言接近，而客家話則完全不同。他也意識到臺灣社會內並不是把他們稱做「客家人」，而是「客人」，其所使用的英文拼寫，正是根據閩南語發音寫下來的。但是，他並未進一步探討臺灣社會慣用的稱呼「客人」，與廣東習用的「客家」之間的差異性，而是直接將二者劃上等號，混為一談，這種做法大抵到了十九世紀末已經相當普遍。

我們由此可以看出，對於臺灣地方社會的人而言，「客家」其實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外來詞，它是廣東廣府話語境下對外來人的稱呼，經過西方人的轉介，被引進臺灣社會。而這些西方人有關臺灣客家種族想像的背後，是從廣東、香港及東南亞殖民地吸收觀念的嫁接。這一詞彙和種族想像，隨後便被甲午戰爭後從清政府手中接管臺灣的日本殖民者所吸收。

在日本統治臺灣初期，基於認識臺灣的需要，官方鼓勵並贊助各種紀錄、研究、調查與出版，西方人士有關「客家」的觀念因而進入日治初期的日文出版品。如東京帝國大學地質學科畢業的小川琢治（1870-1941）於 1896 年編輯出版的《臺灣諸島志》一書，便是一例：

> 支那移住民中稱為客家 Hakkas（原註：另外類似客仔而作哈喀）的種族，他們的容貌風俗雖然看起來和其他支那人並沒有什麼不同，卻被支那人看作另外一個種族。[18]

當時也是日本國內人類學者等探索日本種族起源的年代，關於人種的觀

17 必麒麟著，吳明遠譯，《老臺灣》，頁 34; W. A. Pickering, *Pioneering in Formosa*, pp. 66-67.

18 〔日〕小川琢治，《臺灣諸島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 據明治 29 年〔1896〕東京地學協會版影印），頁 167-16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念，首先由西方人及接受教育的知識分子傳播。[19]東京帝國大學是當時日本帝國的最高學府，也是影響帝國內近代人種觀念傳播的中心。小川的論說實際上源於法國傳教士畢安（Charles Piton, 1835-1905）在 1893 年出版的《廣東遊記》，後者將客家與福佬視為不同於本地（指廣府人）的兩個人種，並將其歷史追溯到唐代的黃巢之亂。[20]東京的幾個大圖書館很可能都有收藏畢安的書，1904 年日本國會議員竹越與三郎寫下的《臺灣統治志》，其中有關客家的觀點也受到他的影響。[21]在《臺灣諸島志》一書的謝辭中，小川還提到當時該校著名的史學科教授普魯士人李斯（Ludwig Riess, 1891-1925），執教東京帝大達十五年，是將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歷史科學引進日本的重要人物。李斯於 1897 年以德文撰寫的《臺灣島史》（次年被譯成日文）一書，也有專章論述客家人與臺灣的關係，將客家人比喻為猶太人，其觀點被 1903 年著有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History*（《臺灣之過去與現在》）的 James W. Davidson 所接受。[22]

有關「客家」種族的認識，不止在日本國內的象牙塔中發酵，也一

19 〔日〕小熊英二，《單一民族神話の起源：日本人の自畫像の系譜》（東京：新曜社，1995），頁 19-32。

20 Charles Piton, M.ch, *Une Visite an Pays de Hakka dans la Province de Canton*, Bull d. l. Soe. Nenchateloise de Geogr. Tome VIII. 1892-3, pp. 31-41. 轉引自小川琢治，《臺灣諸島志》，頁 142，不過小川引用時將其名寫作 Pinton，應為誤植。

21 E. Raoul, *Les Gages Nécessaires* (Brest: Imprimerie Gadreau, 1885), p. 17. 轉引自白尚德，《十九世紀歐洲人在臺灣》，頁 117；〔日〕竹越與三郎，《臺灣統治志》（臺北：南天書局，1997 據 1905 東京博文館版影印），頁 188-189。

22 李斯認為他們是被中國人輕視的種族，在明初便開始大量移居臺灣，其歷史及遭遇可與德國的猶太人相比較。這種說法，與其說是歷史事實，不如說是出身猶太人家庭的作者，將歐洲史觀與自身經驗投射到臺灣的結果。Ludwig Riess（ルードウィヒ・リース），吉國藤吉譯，《臺灣島史》（東京：富山房，1898），頁 41-42；James W.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History, People, Resources, and Commercial Prospects: Tea, Camphor, Sugar, Gold, Coal, Sulphur, Economical Plants, and Other Produc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Macmillan & co.; Yokohama [etc.] Kelly & Walsh, ld.1903), p. 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度影響到臺灣地方社會治理的層面，這類記載主要集中在南部以民間武裝組織聞名的客家聚居區六堆。在接收臺灣的過程中，日軍曾發布一道師團命令，其中提到「在枋寮、鳳山間有很多客家賊」。[23] 1895 年底，鳳山出張所（管轄區域包括六堆地區）與南征支隊在巡視轄區後提交的報告中，特別提到「有關喀家之事」，稱「喀家」（有時亦寫作「客家」）是廣東遷移住民之總稱，內容則集中敘述六堆的組織和歷史。[24]殖民政府也曾一度欲將六堆的「客家人」納入一獨立政區，以便管理，1897 年上半年，民政長官水野遵（1850-1900）與臺南縣知事磯貝靜藏（1850-1910），討論在六堆地區設立內埔辦務署來管轄「喀家族」地盤之事，臺灣總督府檔案中即留有相關紀錄。[25]水野遵通曉漢文，1870 年代便曾視察清國及遊學香港，1874 年牡丹社事件後，隨首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1837-1922）來臺調查。[26]磯貝靜藏則曾主導《臺南縣志》的編修，對於早期該地關於六堆客家的討論相當熟悉。雖然這一設計僅維持了月餘，便因閩客村莊交雜的實態而取消，卻成為客家種族觀念一度影響行政規劃的證據。

與西方人不同的是，日本人也採用漢字，治臺初期努力搜集中文文獻及徵詢地方士紳，以了解清帝國治臺的種種制度。很快地，殖民地官

23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二）領臺以後の治安狀況》（臺北：南天書局，1995），頁 132。

24 鳳山出張所，〈明治 28 年 12 月份月報〉，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明治 28 年（1895）乙種永久保存，卷 16，文號 14。在日治最初幾年間，日本人有時將「客家」寫作「喀家」的原因，筆者目前尚無法作出明確的解釋。

25 〈六堆部落ニ辦務署設置ノ件〉，《臺南縣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明治 30 年（1897）永久保存，內務門庶務部，卷 9726，文號 8。

26 當時水野遵還帶有對日本制定侵臺政策有很大影響的美國人李仙得繪製的地圖，李仙得對於西方人有關客家的論述也很熟悉。〔日〕藤崎濟之助著，全國日本經濟學會譯，《臺灣史與樺山大將——日本侵臺始末》（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3），頁 190-220；王元穉編，《甲戌公牘鈔存》（臺北：臺灣銀行，1959），頁 12；吳密察，〈綜合評介有關「臺灣事件」（一八七一～七四）的日文研究成果〉，收入氏著，《臺灣近代史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1991），頁 218-22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員和知識階層務實地摒棄了部分西方紀錄中客家人「非我族類」的看法，用詞回歸清帝國的籍貫分類，並試圖用種族觀念理解傳統的籍貫分類。如在 1899 年由兩位日本人及臺南閩籍舉人蔡國琳（1843-1909）等人編修的《臺南縣志》記載：

> 粵族又稱為客家族，其莊稱為粵莊或客莊，移民自南中國廣東，是鳳山原野上的一大種族，具有特殊的風俗習慣。[27]

這是日治初期，清帝國下的人群分類觀念與種族觀念融合的最佳例證。在蔡國琳等人的觀念中，「粵人」、「粵莊」都是以原籍指稱的人群，「客莊」是相對於作為本地人的「閩莊」而言，並不帶有種族含義。但是帶有種族觀念的日人，則將粵人等同於「粵族」，客人等同於「客家族」，從而將二種不同的觀念混同起來。

日本殖民者對於「客家」的種種表述，集中在日治最初的幾年，也就是殖民政策還在變動和調整的時期。在殖民地秩序穩定、治臺政策確立後，日人將閩、粵的籍貫概念轉化為「閩族」、「粵族」或「福建族」、「廣東族」的族稱，並將之改造成在風俗、語言、文化方面有差異的種族概念。雖然「客家」一詞幾乎在臺灣社會消聲匿跡，客家族群卻可謂是按照心目中「客家」種族的印象，來塑造臺灣社會的「粵族」。臺灣南北地方社會的差異，一方面被身分登記制度固定化，另一方面則在文化上被消解和抹殺了。

三、「廣東」種族下的客家塑造

從 1905 年開始，臺灣總督府開始在臺灣推行近代的戶口調查和登記制度，臺灣漢人以省籍代替種族身分，遂被固定下來，此舉對臺灣社會的種族分類和想像有深遠的影響。

---

27 臺南縣廳編纂，《臺南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 據臺南縣明治 32 年〔1899〕版影印），第 4 編，縣治沿革，頁 1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一些臺灣人的家裏，現在還藏有日治上半葉的戶籍謄本，其中便有「種族」一欄，呈現殖民政府對於殖民地人民分類的興趣。[28]問題是，當臺灣社會的普通鄉民遇到拿著戶籍單到家中調查的保正和警察時，該如何回答自己屬於哪一「種族」呢？當時指導填寫表格的工具書如是說明：「種族欄內，需依父之種族，須記載內地人、本島人（福建人、廣東人、其他漢人、熟蕃人、生蕃人）、清國人之分別。其父之不明者，須依母之種族。」[29]表面上，這是賦予種族繼承性，實際上，它亦賦予當時參與戶口調查的人塑造自己及祖先種族屬性的機會。

那麼，到底是什麼因素影響當時人對種族的抉擇呢？日治時期的紀錄顯示，殖民政府非常重視語言與種族的關係，語言也成為判定種族的標準。在 1905 年戶口調查的項目中，臺灣的土語被分為福建語、廣東語、漢語、蕃語幾類。[30]當時臺灣地方人士便指出：

> 又在廣東語，即本島所謂客話，是亦廣東省一隅之語，非純然廣東語也。而概記其為廣東語，似不無遺憾云。然據當道所云，自來言語與種族，實有密接之關係。在漢人系統之本島人，為之大區別，蓋由福建與東廣（按：原文如此，疑為廣東之誤）移來者，其子孫眾多，故其言語，亦就其種族，而為大派別，不為小條分。[31]

日本知識分子受到近代人種學與語言學觀念的影響，認為種族和語言密切相關，這對臺灣地方人士的認同而言，是一個巨大的變革。在此之前，臺灣人民依據與生俱來的籍貫定義自己，然而在日人的統治下，他們以語言選擇族類認同。不過，由於殖民政府考慮行政上的簡便，最終還是以籍貫取代語言，因此地方人士在種族欄中填寫的「福」、「廣」，到

28 〔日〕藤村源泰郎、岡野才太郎，《漢文戶口要鑑》（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06），頁 16；〔日〕井出季和太著，郭輝編譯，《日據下之臺政》（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3），頁 3-5。

29 藤村源泰郎、岡野才太郎，《漢文戶口要鑑》，頁 23。

30 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部，《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集計原表》（臺北：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部，明治 40 年〔1907〕），第 1 冊，全島之部，明治 38 年（1905），頁 1208。

31 〈國勢調查辯疑〉，《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5 年 7 月 12 日，第 2 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底是指籍貫還是語言，便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

對比日治時期臺灣南北客家聚居地區以籍貫及種族兩種不同方式統計的人口數，我們便不難察覺兩者之間的不對稱關係（見表一、表二）。

選擇這些庄作比較並不是沒有原因的。北部桃竹苗地區是惠州府、潮州府移民最集中的幾個庄之所在，其中桃園中壢的新屋庄，祖籍惠州府者多達約 16,300 人，依次減少，至觀音庄、寶山庄亦有約 8,800 人；祖籍潮州府者最多的為新竹地區的新埔庄，達 6,300 人左右，龍潭庄也有約 4,100 人。而南部六堆及周邊地區的惠州府移民則數量很少，如表二所示，只有六龜庄內有約 400 人；而潮州府移民最為集中的潮州庄有 2,200 人左右，依次遞減至新埤庄約有 500 人。歷史上，惠州府、潮州府內雖有講客家話的人群，但大部分地區的語言都是混雜多元，講福佬話者為數亦夥，[32]他們對於種族身分的選擇，便成為檢驗日治時期種族分類影響的合適變量。

32 如中國晚清相當活躍的德國外交家和語言學家馬倫篤夫（Paul Georg von Möllendorff）19 世紀末期的觀察，「一個屬於閩語群的獨立方言群是汕頭話（the T'iechin or Swatow dialect），是廣東省潮州府各地區的語言，講的人超過五百萬。在『福佬』（Hoklo, Fukinese）的名稱之下，它在廣東省東南地區及沿海一帶使用，並在這些地區與客家話相競爭。……以下的縣份主要講汕頭話：潮州府有八個縣，第九個縣，也就是大埔，是客家人佔據的地區；惠州府的十個縣中，七個縣主要講客家話，另外三個東江以南的縣份，也就是陸豐、海豐與歸善，則主要是福佬人。」P. G. von Möllendorff, "On the Foreign Languages Spoken in China and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Chinese Dialects," *China Mission Hand-Book* Vol.1 (1896, Shanghai), p. 5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一　日治時期新竹州下八庄以籍貫及種族統計人口數對比表

	種族別（1925）				籍貫別（1926）			
庄別	福建人	廣東人	漢民族合計	總人口合計	福建省	廣東省	漢民族合計	總人口合計
新屋庄	1,103	15,282	16,385	16,385	300	17,400	17,700	17,700
新埔庄	279	20,899	21,178	21,189	100	20,600	20,700	21,200
竹東庄	284	11,977	12,261	12,285	100	12,900	13,000	13,000
觀音庄	3,748	9,150	12,898	12,900	4,300	10,100	14,400	14,400
寶山庄	558	9,050	9,608	9,612	500	9,400	9,900	9,900
關西庄	188	20,796	20,984	21,001	400	20,700	21,100	21,200
芎林庄	96	9,670	9,766	9,767	0	9,300	9,300	9,300
龍潭庄	1,811	15,717	17,528	17,539	1,900	16,400	18,300	18,300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大正十四年國勢調查結果表》（臺北：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1927），頁 186-199；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臺北：臺灣時報發行所，1928），頁 12-15。

表二　日治時期高雄州下八庄以籍貫及種族統計人口數對比表

	種族別（1925）				籍貫別（1926）			
庄別	福建人	廣東人	漢民族合計	總人口合計	福建省	廣東省	漢民族合計	總人口合計
潮州庄*	6,713	708	7,421	8,295	4,600	2,800	7,400	7,400
鹽埔庄*	6,504	2,197	8,701	9,114	6,400	2,100	8,500	8,500
萬巒庄	2,822	6,629	9,451	11,508	1,700	7,700	9,400	9,400
杉林庄	561	2,849	3,410	5,327	300	2,600	2,900	3,200
高樹庄	4,109	4,339	8,448	9,424	4,200	4,400	8,600	9,500
六龜庄	418	2,204	2,622	5,212	3,000	1,700	4,700	4,700
美濃庄	180	17,237	17,417	17,517	200	17,700	17,900	18,000
新埤庄	606	3,467	4,073	5,471	0	4,000	4,000	4,000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大正十四年國勢調查結果表》，頁 278-287；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頁 26-27。

說　　明：*該庄並不在今天的六堆範圍內，但即使被歸入六堆的各庄，也不是全部人口，而是客語群體集中的村落加入六堆聯盟。其他語言群體集中的村落，則可以透過繳錢的方式，獲得六堆聯盟的保護。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雖然日治時期的數字統計並非精確可信，我們也不能期待不同地區是按照相同原則統計，[33]然而不難看出表格中大部分的庄內，按籍貫別統計的廣東省移民數均高於按種族別統計的「廣東種族」人口數。換句話說，移民自廣東省的人與被定義為廣東種族的人，並不完全是同一批人。之所以出現這種不對應的情況，與部分來自廣東省潮州府、惠州府的移民在選擇種族身分時，棄「廣東人」就「福建人」有關。例如南部潮州庄的陳氏家族，來自廣東省潮州府普寧縣，其家族成員陳朝海在戰後編修的族譜中感嘆：

> 馬關條約簽訂，臺灣橫遭痛割，由是日寇君臨於斯土，立採隔離奴役政策，在驅使鞭役如皂隸與夫矇蔽錮塞的交替運用原則下，凡恆操閩南語者，統稱為「福建人」，而長用（按：原文如此，當為常用）客家語者，概稱為「廣東人」，初不問「福建」「廣東」兩省的語言究有何差別，於是處此皂白不分、涇渭不明的顢頇「倭奴政策」下，我等常用閩南語而籍隸於粵東者，竟搖身一變而不自覺地承認為「福建人」，事之可扼腕兼喟嘆的，孰有甚於這個嘛？是以每一思及，長為之髮指！[34]

陳朝海出生於 1909 年，其父陳球從日治初期便擔任地方保正，戶籍調查

33 1926 年的漢人祖籍調查，以百人為單位，故數字與實際人口數會存在少許差異。而對比兩年人口數變化，北部地區的八個庄，除了芎林庄外，1926 年人口總額均高於 1925 年，但如新屋、觀音庄等地，一年間人口總數驟升超過千人，這並不是自然增長可以達到的，可能要加入移民的因素。而南部除了美濃、高樹庄外，1926 年人口總額均低於 1925 年，其原因則在於是否將「熟蕃」計入總人口。這也是南北人口登記上一個極大的差異，北部人口登記中，「熟蕃」人數已經微乎其微，最多的龍潭庄也僅有 10 人，而南部則還保留大量「熟蕃」人口，如六龜庄超過 2,500 人，萬巒、杉林庄也有近 2,000 人。另外，與其他 1926 年的人口統計數字對比就可以發現，北部的芎林庄、南部的六龜庄總人口數字均出現很大誤差，部分人口在籍貫別部分被「遺失」了。六龜庄籍貫為「福建」者高達 3,000 人，這其中大部分很可能都是「熟蕃」。除了表格中的統計書，另外參見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編，《臺灣現住人口統計》，昭和元年（1926）（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1927），頁 26-34、62-67。

34 陳朝海編，《普寧樂善堂陳家族譜》（出版地、出版者不詳，1972），頁 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是其職責所在。[35]可能因此緣故，陳朝海對當時的調查原則有所了解。摒除戰後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用語，這段話的意思十分明白，即日治初期戶籍中的種族欄是以語言為分類標準，因此，南部有不少來自廣東省潮州府的移民自認為「福建種族」，這與屏東平原地區長久以來不同語言群體的分類有很大的關係。

可以看出，日本殖民政府是在「廣東種族」的標籤之下塑造「客家」族群，但「廣東種族」到底有多少人來自廣東省，多少人講客家話，則還有待細緻的分析。而在日本殖民政府以籍貫代替種族作為族群分類標準的時候，地方人士已經基於語言習慣、居住地域及歷史因素等，靈活地做了選擇。關於這種選擇及其影響，目前的研究亦有待深入探討。另一方面，這種以籍貫取代種族的做法，若實施在語言複雜的廣東省內，很容易產生混淆，畢竟廣東省內講廣府話（又稱粵語、白話）的人群覺得自己才是「廣東人」，但由於臺灣成為割裂於中國華南地區之外的政治實體，這種區分在臺灣社會內部便能暢行無阻。[36]

日本時代的知識分子們，在另外兩方面，也對於塑造「泛臺灣客家認同」影響深遠。其一便是自舊慣調查以降知識分子們對於客家特殊風俗文化的論述，如著名的人類學家伊能嘉矩（1867-1925），便曾在 1901 年臺灣慣習研究會的首期會刊《臺灣慣習記事》上，論述「閩屬」與「粵屬」的差別：

> 中國人初圖移殖於臺灣，係在明代中葉以後，其籍多為福建、廣東二省人，福建移民稱為閩屬，廣東移民稱為粵屬，兩者雖同屬中土漢族，其氣質有異，語言亦異，猶如古代希臘之雅典人與斯巴達人。[37]

35 陳朝海，《陳球公行狀》（臺北：陳朝海、陳馬岱、陳延慶印，1975），頁 8。

36 實際上這種以大的省籍劃分語言的做法，臺灣地方人士也可能產生誤解。如擔任《臺灣日日新報》記者的新竹人魏清德，赴香港遊覽時便發現「地皆廣東語，與臺灣之廣東人全異，故余弗能通」，便是由於香港的廣東話乃是廣府話，而臺灣的廣東話乃是客家話所致。潤庵生，〈南清遊覽紀錄（五）〉，《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 年 1 月 21 日，第 1 版。

37 〔日〕伊能嘉矩，〈分類械鬥〉，收入臺灣慣習研究會原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譯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慣習研究會成立的目的是調查、了解臺灣的舊慣，以便實行與日本本土不同的統治政策，由臺灣總督和民政長官任正副會長，伊能時任該會幹事。從文中可以看出，伊能並未明確區分「閩屬」、「粵屬」和清代籍貫分類的差異，但他已經明白表明，二者是兩個同源但語言文化不同的群體，因此用古代希臘的雅典人與斯巴達人來類比。也就是說，伊能試圖表達這一人群的分類方式，代表的並非不同移民群體地位上的差別，而是種族文化上的差異。

由此，尋找並記錄兩個群體之間的文化差異，便成為日治時期知識分子關注的要點。1902 年《臺灣慣習記事》第二卷第七號曾登載會員李坪生的文章〈閩族婦人及粵族婦人〉，當中寫道：

> 在我臺灣習慣上區別閩粵兩族婦人之標準，雖有右揭三點（按：指婦人勞動、頭髮結法、纏足），但今檢視為其故國之閩粵各地實際情形，則此等區別之標準，已消滅既久矣。蓋閩粵各地均屬開港地或與之接近之交通便利之地，因外客出入及相互往來等種種原因，應係因此而被自然同化，獨我臺灣由於遠僻在海東交通不便之一孤島，種種習慣自然較易永久保存也。[38]

從作者的論述來看，在當時的臺灣社會，更準確地說，在臺灣慣習研究會官員與知識分子的圈子裏，對閩粵兩族婦女認識的差別是相當清楚的，也就是說，粵族女性參與勞動、有特別的髮型並且不纏足。這一觀點，在十九世紀後期西方人關於客家女性的論述中也很常見，李坪生等知識分子雖然在用詞上採用「粵族」，而不是「客家人」，但背後蘊含的種族特性是一致的。他假設中國大陸閩粵的女性過去也具有這樣的文化特色，只是已經消失不見。在其後該刊的插圖中，這一特殊文化特色

《臺灣慣習記事》（中譯本）第壹卷上（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4），頁 9；原文刊登於《臺灣慣習記事》（日文版）第一卷第一號（1901，臺北），頁 25-35。

38 李坪生，〈閩族婦人及粵族婦人〉，收入臺灣慣習研究會原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譯編，《臺灣慣習記事》（中譯本）第貳卷下（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7），頁 28；原文刊登於《臺灣慣習記事》（日文版）第二卷第七號（1902，臺北），頁 44-4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清晰可見。（見圖一）。

圖一　粵族婦人



資料來源：《臺灣慣習記事》（日文版）第三卷第九號（1903，臺北），卷首插圖。

殖民地知識分子也相信，不同地域的移民各有其不同的祭拜神明，因而將神明崇拜視為可辨識種族的文化特徵之一。將三山國王視為客家人的鄉土神，便是另一個十分重要的文化創造，如慣習研究會的安藤靜稱：「三山國王廟，如非為廣東省潮州人就不會創立。」[39]他所稱的潮州人，大概包含了潮語群體和客語群體。但是日治中期進行宗教調查的丸井圭治郎（1870-1934），與日治後期進行臺灣全島宗教調查的增田福太郎（1903-1982），則一致將三山國王歸為「廣東人」的鄉土神。[40]至於義民廟，由於北部新竹新埔義民廟財力雄厚居全臺之冠，報紙在詳細報導其每年盛大的祭典活動之餘，也不會忘記提及它和「廣東種族」的關係。由於日本殖民者以籍貫指稱種族的取巧辦法，造成日後大眾對於「客家人」的特徵認識上含混的根源。在戰後將廣東種族置換為客家人的過程中，這些文化創造便多被貼附在客家人身上了。[41]

39 〔日〕安藤靜，〈臺灣的公業〉，收入臺灣慣習研究會原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譯編，《臺灣慣習記事》（中譯本）第五卷下（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1），頁 259；原文刊登於《臺灣慣習記事》（日文版）第五卷第十二號（1905，臺北），頁 1-26。

40 〔日〕丸井圭治郎，《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臺北：捷幼出版社，1993 據臺灣總督府大正 8 年〔1919〕版影印），頁 40；增田福太郎，《臺灣の宗教，附臺灣本島人の宗教》（臺北：南天書局，1996 據昭和 10 年〔1935〕東京養賢堂版影印），頁 32。

41 近年經過學者們的研究，這一觀念才較為釐清。陳春聲，〈三山國王信仰與臺灣移民社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80 期（1996，臺北），頁 61-114；邱彥貴，〈三山國王信仰：一個臺灣研究者的當下體認〉，《客家研究輯刊》第 2 期（總第 33 期）（2008，梅州），頁 49-5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其二，客家話在「廣東語」的標籤之下，於日治時期出現了第一波逐漸標準化的過程，這是日治時期知識分子對於塑造客家族群的第二大重要影響，背後也與殖民地治理的需要有關。

早在日治初期，為了土地調查等行政治理的實際需要，殖民地警察已經積極學習和記錄客家話，並發明用假名標記客家話的辦法。[42]至 1915 年，已出現客家語學習的專書，當時桃園地區的警察官志波吉太郎，為進行人口調查，編寫了《廣東語會話篇》；隨後於 1919 年，時任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教師的苗栗人劉克明，為有興趣學習客語的人編撰《廣東語集成》；1932 年，臺灣總督府更出版了《廣東語辭典》；[43] 1933 年，臺北第二師範學校的教師菅向榮及新竹州警察河野登喜壽（1928 年警察官練習所廣東語特科畢業）也分別出版了有關廣東語的書籍。[44]

不難發現，在北部桃竹苗客語人群集中的地區，地方官吏及警察面對行政區劃內大部分人口講的不是臺灣通行的閩南話，對於學習客家話有迫切需要，地方知識階層菁英也積極推動，使客家話研究在這裡特別興盛。編寫者大部分為在北部桃竹苗地區任職的日本警察、地方官及本地知識菁英，他們之間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劉克明是第一代諳熟日語的地方菁英，菅向榮是他的學生。菅氏原名徐向榮，苗栗縣人，據說因入贅日人家庭才改日姓。[45]河野登喜壽則又是菅向榮的學生，他的書也經過菅氏的校閱。

---

42 羅濟立，〈統治初期日本人之臺灣客語學習——「廣東語」『臺灣土語叢誌』的成立及其音韻表記、語彙〉，《東吳外語學報》23 期（2006，臺北），頁 87-123；羅濟立，〈日本統治初期之客語假名遣考——以「廣東語」『臺灣土語叢誌』的同字異注為例〉，《東吳外語學報》24 期（2007，臺北），頁 65-100。

43 〔日〕志波吉太郎，《廣東語會話篇》（臺北：臺灣日日新聞社，1915）；劉克明，《廣東語集成》（臺北：新高堂發行，1919）；臺灣總督府，《廣東語辭典》（臺北：臺灣總督府，1932）。

44 菅向榮，《標準廣東語典》（臺北：古亭書屋，1974 據 1933 年版影印），〈凡例〉，頁 1；〔日〕河野登喜壽編，《廣東語の研究》（新竹：新竹州警察文庫，1933），頁 1。

45 陳運棟編，《重修苗栗縣志》（苗栗：苗栗縣政府，2006），卷 32，〈人物志〉，頁 40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那麼，所謂的「廣東語」，實際是指什麼呢？1915 年，志波吉太郎已經明確指出其書中記錄的是「四縣語」。所謂「四縣」，指廣東省境內興寧、長樂（今五華）、鎮平（今蕉嶺）、平遠四個縣。[46]這四個縣在清代均隸屬嘉應州管轄（梅縣是 1914 年新設，當時著者並未將之計入），現在人們普遍將之視為客家移民的大本營。志波吉太郎也注意到「廣東語」下還有其他分支，但是由於應用不多而不收錄。不過，根據語言學家橋本萬太郎（Mantaro J. Hashimoto, 1932-1987）的研究，志波吉太郎書中所謂的四縣話，其實很多也是「海陸」話。[47]

四年後，劉克明的「廣東語」分類中，則在「四縣」話之外新增了「其他」類別的說明：

> 臺灣的廣東語可以分為四縣（興寧、長樂、鎮平、平遠）、海陸、堯平、永定、風順（按：應為豐順）、河婆等種類。其中四縣話佔大部分，海陸與堯平話次之，其他則數量極少。[48]

所謂「海陸」，指廣東省海豐、陸豐縣，清代屬惠州府管轄；「堯平」、「豐順」則是清代廣東省潮州府轄下的兩個縣，河婆也在潮州府內，但地域單位要小得多，是揭西縣下面的一個城鎮；「永定」指福建省永定地區，清代屬於福建汀州府。這些以不同層級地域為名稱的次方言劃分，顯示出劉氏試圖釐清臺灣客語方言的努力，日治後期研究者即使對他的分類及使用者情況描述稍有調整，也都不脫劉氏建立的框架。

日治時期知識分子所確立的客家話「四縣」、「海陸」的分類法，為臺灣社會所特有，換句話說，是臺灣殖民地範圍內的移民來源決定了這一分類方式。直到今天，這兩大類別仍是臺灣客家話的主要分類方式。不過，若按照近代以來大陸語言學者的研究，海豐、陸豐與饒平地區大部分人講的是閩語，也就是福佬話，講客家話的地區比例很小。[49]香港

---

46 志波吉太郎，《廣東語會話篇》，例言，頁 1。

47 Mantaro J. Hashimoto（橋本萬太郎）, *The Hakka Dialect; A Linguistic Study of Its Phonology, Syntax, and Lexic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23.

48 劉克明，《廣東語集成》，頁 1。

49 如果搜閱當代廣東省閩南語地區的各縣縣志，就會發現各地的「閩南話」（或潮汕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語言學者劉鎮發在闡述臺灣客家次方言分類時，也未將「海陸」話列入其中，而是稱它具有粵中次方言的特點，也就是說，海陸話是否該歸為客家話，還值得商榷。[50]受過現代語言學訓練的臺灣當代學者們，透過與中古音韻縱向比較、不同方言橫向比較的方法，找出海陸、饒平、河婆等客家話分支，與潮汕閩語也存在不少共通的成分。[51]客語所認定的語種變化，值得研究者更深入追究，本文意在指出，由於「四縣」話在臺灣應用最廣泛，選擇四縣話作為廣東語的代表，正如河野登喜壽所假設的，「如果懂得四縣話，則廣東人居住的地方都可以通行，因此本書主要研究四縣話」。[52]他們的舉動，在客觀上標準化了該方言。

從以上的變化可以看出，儘管日治時期的知識分子並沒有用「客家」一詞，他們理解的「廣東種族」和今日的「客家」族群，界限並不完全一致，卻不能掩蓋日本殖民統治對於今日臺灣社會理解「客家」族群的深遠影響，從戶口登記等制度對種族觀念的傳播，到對其語言、拜祭、女性等文化特徵的關注，日治時期殖民政府及知識分子對於客家族群的塑造，可謂滲透到諸多方面。當然，這背後更有日本帝國下臺灣殖民地行政建設，近代印刷術及近代教育普及等因素的影響。也正是在這些創造之下，「泛客家族群認同」纔有了基礎。

然而，若只將眼光囿於臺灣，便不能理解日治中後期臺灣客家塑造的一些關鍵因素。日本殖民母國及中國大陸國民政府內部發生的變化，

潮語），也都是後來的定義，當地則多以本地地名名之，且編者還往往強調本地語言和其他潮語的差別。何況這些地區也有一些無法歸類的「本地話」（土話），更顯示出當地語言體系的複雜。

50 劉鎮發，〈客家人的分佈與客語的分類〉，收入李如龍、周日健主編，《客家方言研究：第二屆客家方言研討會論文集》（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8），頁 53。

51 邱湘雲，〈海陸客家話和閩南語構詞對比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5）；徐貴榮，〈台灣饒平客話音韻的源與變〉（新竹：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吳中杰，〈屏東市林仔內的揭陽河婆客家話：兼論海陸客語聲調類型的起源〉，收入高雄師大客家文化研究所編，《客家社會與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津出版社，2007），頁 53-73。

52 河野登喜壽編，《廣東語の研究》，頁 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均對其產生直接的影響，這些變化也為「客家」標籤再次進入臺灣開啟了方便之門。

四、民族主義還是殖民主義？

作為日本帝國一部分的臺灣殖民地，在日治初期逐漸被納入帝國文化體系，彼時「客家」族群塑造，便是以「廣東種族」為標籤，以臺灣殖民地為範圍進行的。但是，臺灣社會並非完全沒有接觸中國大陸廣東地區日漸興起的「客家」論述，在 1915 年 9 月的《臺灣日日新報》上，便曾分兩期連載一篇題為〈粵省客族考原〉的文章，詳細記載所謂「客家」源流。文中雖沒有標註作者為何人，但比對之後發現，該文實為廣東省客家人鍾用穌（號獨佛，1863-1923）所著。鍾用穌是具有強烈客家自覺意識的知識分子，該文是為駁斥當年上海中華書局所編地理課本及商務印書館英文地理教科書中，貶斥客家之言而作，曾刊登於《汕頭公言報》、《廣州七十二行商報》、北京某報等，並出版成專書《粵省民族考原》。[53]

這一客家論說的背景，是二十世紀初以來伴隨民族主義與人種觀念的發展，中國大陸客家人自覺意識的提升。客家人在民國政治體系中的地位日升，軍、政、文等各領域中，均湧現不少客家菁英，社會上一旦出現冒犯客家的言論，很容易招致他們的集體抗議。[54]陳永海的研究則強調，正是由於當時華戎之別成了更根本的政治概念，客家知識分子才緊張於應付這一類攻擊。[55]臺灣雖然處於不同的政治環境，但顯然兩岸

53 鍾獨佛，《粵省民族考原》（香港：方樹福堂，1989 據民國 10 年〔1921〕卷密精廬石刻本影印）。

54 Leong Sow-Theng, *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Chinese History Hakkas, Pengmin, and Their Neighbor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83-88; 程美寶，《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清末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北京：三聯書店，2006），頁 251-259。

55 陳永海，〈作為中國國族事業的客家言說——從香港看近代客家文化認同性質的變遷〉，收入劉義章編著，《香港客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頁 37-4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交流仍極為密切，因此可能有臺灣的知識分子注意到鍾獨佛的著作，並加以轉載。

當然，由廣東照搬來的觀念未免隔靴搔癢，民族主義對於臺灣客家菁英更為直接的影響，則是在殖民母國——日本社會內發酵的。1920 年代左右的日本，正處於大正民主時期政治控制較為寬鬆的社會環境下，不少留學日本的臺灣青年，便在日本受到民族主義的初次激盪，從鄉貫和方言意識轉化而來的我群自覺意識，也伴隨政治意識的覺醒而日益上升。和臺灣有些淵源的丘逢甲之子丘念台（當時名丘琮，1894-1967），便是其中的核心人物。

丘念台出生於臺中，次年因其父領導抗日失敗而返回中國大陸。其家世背景及近代革命風潮的影響，令 1913 年即赴日留學的他念念不忘與臺籍人士的聯絡（見圖二）。1919 年已入讀東京帝國大學工學院的丘念台，組織臺籍學生成立「東寧學會」，其自傳中這樣記錄：

> 民國八九年間，我進讀東京帝大不久，便依照自己的預定計劃，進行組織臺籍學生的工作，目的在使他們和國內發生聯繫作用，因為我當時不懂閩南語，所以第一步聯絡對象為客家籍臺灣青年，其次才及於閩南籍臺灣青年。最初聯絡的人物，現在臺省為人所熟知的，如鄭昌英、陳尚文、翁瑞淡（按：即翁鈞，臺灣桃園人）、翁瑞國、鄭松筠、蕭秀利等是。後來決定組織名稱是「東寧學會」，因臺灣在明末鄭氏時曾稱東寧府，所以借用「東寧」以隱「臺灣」。[56]

可以看出，丘念台能與臺灣客家菁英聯為一氣，語言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他提到的翁瑞淡、翁瑞國為北部桃園人，蕭秀利為南部六堆的左堆佳冬人，都是講客家話的人。

56 丘念台述著，《嶺海微飆》（臺北：中華日報社，1962），頁 9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二　原題「在日本東京之臺灣籍革命志士合影」



資料來源：劉燕夫編，《劉兼善先生八秩大慶祝壽冊》（臺北：編者，1980），頁 271。

說　　明：前排右二為丘念台，左一為劉兼善。攝於 1914 年 7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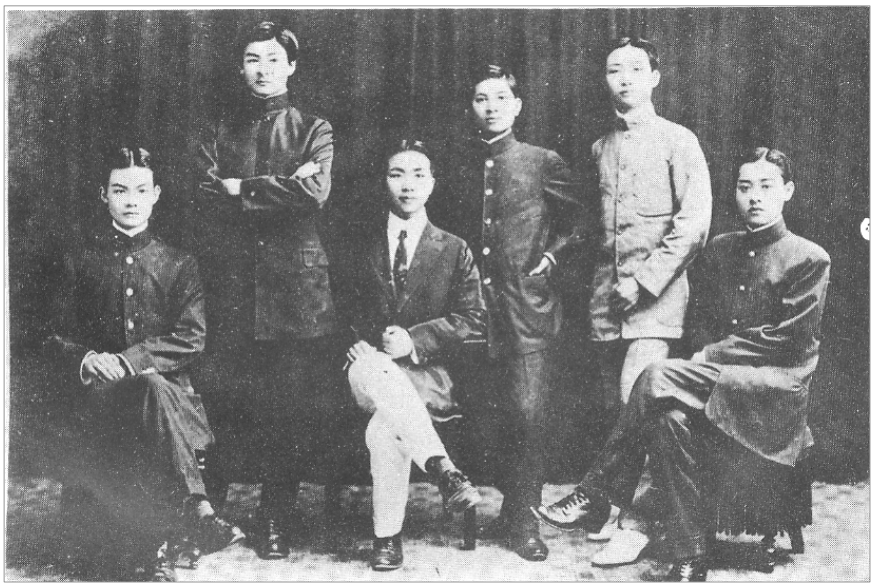
在日本警察機構的眼中，東寧學會初期是一個以臺灣及大陸「廣東種族」為主的組織。[57]根據日人調查，最初參加該組織者包括劉達麟（即劉兼善，1896-1972）、鍾桂蘭（1891-1976）等人，幾乎都來自臺灣南部六堆地區（尤其是後堆內埔地區為多，見圖三），1925 年再次組織時，則改以北部桃竹苗地區客語人士為主力，其中祖籍福建永定的中壢人吳鴻爐（1901-?），即是戰後臺灣政壇相當有影響的吳鴻森、鴻麟之弟，吳伯雄的叔父。[58]臺灣客家群體是丘念台活動後發展的基礎。

57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臺北：南天書局，1995），卷 3，頁 933。

58 由於紀錄中對於當時活動的時間、地點及人物都記錄得十分詳盡，其資料很有可能是來自 1930 年代中期日本人在臺灣壓制民族運動時，被捕者的審訊紀錄。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卷 3，頁 933；中譯文見臺灣總督府警務局原編，林書揚等編輯，王乃信等譯，《臺灣社會運動史（一九一三年－一九三六年）》（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三　原題「一群熱愛祖國之客屬留日學生在東京合影」



資料來源：劉燕夫編，《劉兼善先生八秩大慶祝壽冊》，頁 271。
說　　明：前排中坐者為劉兼善，右為鍾桂蘭。攝於 1919 年。

丘念台是否曾有意識地推動客家意識的發展，我們並不知道，但從圍繞這一組織的活動和論說可以看出，激發殖民地臺灣人士的民族意識才是最主要的目的，因此並不為族群所囿。[59]但這些最初在東京受到民族主義刺激的客家菁英，不少人在 1920-1930 年代赴中國大陸工作，從而直接捲入了客家意識與民族主義同步發展的潮流。如劉兼善，留日期間不但加入東寧學會，也與諸多中國大陸客家留學生交往密切，1920 年早稻田大學畢業後赴廣州，翌年加入國民黨，此後一直從事與國民政府有關的工作，他於戰後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後再次來臺，是臺灣南部六堆

北：創造出版社，1989），〈民族革命運動〉，頁 27-28。〈福建永定縣思賢鄉勝昌公來臺世系圖〉，收入申子佳、鄭美倫編著，《吳伯雄前傳》（臺北：開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4），〈附錄〉。

59 丘念台後來與受民族主義刺激、主張臺灣自治的臺籍領袖與學子，如林獻堂、林呈祿、蔡惠如、楊肇嘉等人，也有接觸。丘念台述著，《嶺海微飆》，頁 10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地區客家人士在國民政府中任職最高者。[60]曾就讀於日本士官學校的新竹北埔人黃國書（原名葉焱生，1905-1987），與同縣芎林人、畢業於南京中央大學的鄒清之，更是近代國民政府中諸多客家軍政大員中的臺籍代表。[61]

1925 年丘念台回中國之後，很快即與聞廣東地區的政局。1929 年，出任廣東省政府顧問，與新任省主席陳銘樞（廣東合浦客家人，1889-1965）關係頗為密切。1930 年，他兼任廣東省立工業專門學校校長，在校內設華僑補習班，專門招收臺籍學生。他說：「華僑補習班首次招生，共約四十五人，大多是暗中自臺灣本島先後招來廣州入學的。……現在臺灣省政府委員翁鈴，前任苗栗縣縣長劉定國，以及前中華日報南部版經理李德松等，都是該班的學生。」[62]在其中擔任教師的，也有原屬東寧學會的臺籍客家人。丘氏還組織華僑同鄉會，得到華僑補習班及其他在廣東臺灣人的支持。1931 年陳銘樞倒臺、丘念台失勢之後，一些較激進的臺籍客家人又組織臺灣民主黨，並和丘氏保持聯絡。臺灣總督府對華僑同鄉會及臺灣民主黨這二個組織頗為忌憚，「不管情勢怎樣變化、怎麼困難，它們都不屈服，總是堅忍地持續著運動」。[63]後來臺灣民主黨由於行動太過高調，招致日本殖民政府高度關注，1934 年總督府的廣東特派員逮捕其幹部，並在臺灣島內大舉搜索和檢舉其成員，之前參與華僑同鄉會的一些人也因而被牽連。

由於 1930 年代客家人在廣東政壇特異的突出地位，導致 1932 年日本總領事館在向東京的報告中提出〈廣東客家民族研究〉專文。這位不知名的作者甚至提出「大客家主義」的說法，鮮明地反映出近代中國客

60 劉兼善，〈自傳略〉，鍾壬壽纂修，《六堆客家鄉土誌》（屏東：常青出版社，1973），頁 676-684。

61 自立晚報新竹區分社編，《新竹、桃園、苗栗三縣人士志》（新竹：自立晚報新竹區分社，1952），頁 40、53。

62 丘念台述著，《嶺海微飆》，頁 129-130。

63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原編，林書揚等編輯，王乃信等譯，《臺灣社會運動史（一九一三年－一九三六年）》，第四冊，頁 1-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家人政治勢力上升的勢態。[64]可以看出，臺灣客家人在民族主義運動中的活躍，一方面是客家人身處族群複雜的廣東，在近代民族革命運動中具有特別活躍的地位所致；另一方面則可以追溯到日本近代教育的啟蒙及殖民母國環境下民族意識的覺醒。可以說，它是近代殖民地社會演變的一個極端後果，儘管這並非殖民政府所樂見。

回到臺灣社會，與民族主義同步發展的客家自覺意識影響並不大，但南北客家菁英基於語言與鄉貫意識的聯結卻在強化，這是殖民地社會演變的溫和後果之一。1920 年代之後，殖民地臺灣強調民族融合、經濟發展及中等以下教育普及，使得跨出鄉村、走入城市的客語菁英越來越多。他們也積極組織同鄉會，聯結鄉誼。如 1930 年代六堆客家語群體在臺北組織旅北同鄉會，在臺南有褒忠會；南北客籍人士在日本有組織聯誼會等。[65]以六堆旅北同鄉會為例，其會長是留日期間曾參與東寧學會的李添春，總幹事則是戰後對於推動客家意識極為重要的人物徐傍興。據徐傍興回憶：

> 為了六堆旅北同鄉的團結、鄉誼，我和李先生組織了六堆旅北同鄉會，由李先生出任會長，我就擔任總幹事，開了小型運動會、郊遊、聚餐等，大家都是外出人，所以格外地倍感親切，每位鄉親都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把各項活動都辦得有聲有色。[66]

---

64 當代學者梁肇庭認為這位作者可能過分高估了客家族群的政治勢力，或採用了廣東本地人視客家人為威脅的觀點，從而低估了凝聚不同語言群體的民族主義的力量，但這一論述無疑也反映當時客家人勢力的膨脹。〈廣東客家民族の研究〉，收入宋文炳著，小口五郎譯，《支那民族史》（東京：大東出版社，1940），附錄；Leong Sow-Theng, *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Chinese History: Hakkas, Pengmin, and Their Neighbors*, pp. 88-92.

65 陳國政編，《李添春教授回憶錄》（臺北：冠芳印刷，1984），頁 68-69；黃麗霞等編，《戀戀庄情事——萬巒人的老照片》（屏東：藍色東港溪保育協會，1999），頁 128-131；邱金田，《七十年回顧——由農村生活邁進工業社會的歷程》（麟洛：自印本，1982），頁 40-41。

66 徐傍興，〈我和六堆同鄉李添春先生〉，收入陳國政編，《李添春教授回憶錄》，頁 81-8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可以看出，這些組織的出現，是殖民統治期間島內社會實現一體化以及教育發展的結果。在戰前的社會環境下，客語菁英還不會以「客家」之稱表達自我認同，而且很多時候還會利用其日語能力，隱藏少數族群的身分，以便融入更廣闊的菁英群體當中，但他們在戰後卻往往成為傳播客家自覺意識的主力，正是因為這群在殖民時期地位已經上升的人士，樂於借用這一理論強化其在臺灣政治舞臺的身分地位所致。

臺灣殖民地「客家」族群建構的高潮，恰恰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著名客家研究學者、廣東興寧人羅香林的客家論說，即是在這一時期流入臺灣社會的。

五、戰爭下的民族建構

日本學者小熊英二曾經指出，日本人由單一民族組成的自我想像，是在二戰失敗後逐漸成為主流，在此之前帝國建構的年代，佔據主流的，始終是日本人由不同種族構成的言論（稱為「混和民族論」）。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儘管單一民族理論影響力提升，然而日本政府為了動員殖民地兵力，合法化其對於東亞的侵略，還是不能拋開多民族說。[67]臺灣的「客家」民族建構，就是在這一背景下再次顯現。

1937 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日本殖民政府在臺灣用省籍指代族稱和語言造成的混淆，立即暴露出來。當時，臺灣總督府徵召臺灣殖民地人隨軍各戰場，便曾試圖利用客家人既懂日語、又懂「廣東話」的能力作為通譯，只是在執行後才發覺有問題。如一位六堆地方人士回憶：

> 中日戰爭一開打時，許多客家子弟被誤以為會說廣東話，於是紛紛被徵調前往大陸廣州一帶擔任「通譯」。但因為語言不通，只得用漢字交換訊息，過了半年，才又全員被徵調回來。[68]

67 小熊英二，《單一民族神話の起源：日本人の自畫像の系譜》，頁 325-338。
68 黃麗霞等編輯，《戀戀庄情事——萬巒人的老照片》，頁 10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當時人大概還不會自稱為「客家子弟」，但殖民政府利用殖民地人雙語能力的意圖極為明顯，地方人士也感覺到這一點。正如日治中期少數和廣東、香港有接觸的菁英一樣，日本人和地方人士終於意識到廣東地區語言的複雜性，臺灣的所謂廣東話，和廣東省內大多數人講的「廣東話」（廣府話）並不相同。

隨著日軍攻佔大陸的腳步，日人為了瞭解廣大佔領地——包括中國華南以及東南亞地區——的殖民地屬民，已有部分人士將中國日益興起的「客家」研究情況介紹到臺灣，「客家」這一詞彙才逐漸出現在臺灣社會的出版物上。[69]其中羅香林的客家研究，無疑在日後影響最大。他1933 年便出版《客家研究導論》一書，系統地提出客家民系中原移民說，稱客家人原本是居住於中原山西、河南、安徽一帶的漢族，經過晉代以來的五次南遷，遷到南方之後，在土著民族中間「客而家焉」，並融合同化了他們，形成漢族裏面一個突出的支派「客家民系」。[70]這些觀點當然不完全是創新的，但由於羅氏在民國時期的廣東政壇有很大的影響力，並致力提升客家人政治地位，學術和政治雙重因素的結合，導致其研究隨民族主義的高漲而向外流傳。[71]

羅香林的學說被系統地介紹到臺灣，則是戰爭後期日本帝國內意識形態發生巨大轉變的結果。1942 年，其所著的《客家研究導論》一書，被臺灣銀行臺北分行總經理及調查課長有元剛、日華學會會員濱中直樹翻譯成日文出版。有元剛在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發現這本書，他在日文版前言中曰：

---

69 1938 年 11 月，即有署名「石敢當」的人，在臺灣總督府出版的《臺灣時報》上發表了〈廣東省的民族〉一文，將廣東省的民族分為漢民族系（廣府、客家、福佬）與非漢民族系（蜑民、黎、猺其他）。文中也提到臺灣通稱「廣東人」者，大部分都是漢民族系下的「客家」，講類似官話的客家話。該文主要參考當時中國大陸學者林惠祥、羅香林及郎擎霄的研究。石敢當，〈廣東省の民族〉，《臺灣時報》，1938 年 11 月，頁 136-146。

70 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臺北：南天書局，1992 據 1933 年廣州初版影印）。

71 程美寶，《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清末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頁 242-25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翻譯成日文出版。有元剛在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發現這本書，他在日文版前言中曰：

> 客家又被稱為客族或客屬，以廣東省嘉應市（梅縣縣城）為中心，主要盤踞在福建、廣東、江西、廣西各省山區，以臺灣、海南島為代表，廣泛散居於南方各地區，是所謂的南洋民族調查研究方面不容忽略的一種特異的南支民族……。
>
> 然而，此次大東亞戰爭爆發以來，國民的關心逐漸轉移至南方，雖然開口就說南洋的人必言華僑，但是意識到客家在南方華僑五族中佔有一席之地的人卻寥寥無幾。特別客家總人數據稱有二千萬人，其中居住在臺灣的有五十至七十萬。與之有直接或間接關係的日本島國的有識之士未能認識客家的存在，更遑論認識其實體。[72]

這一時期，也是臺灣總督府從驅逐本土文化的激進皇民化政策，轉向重新正視地方文化的溫和政策的時期。1941 年中至 1945 年初發行的《民俗臺灣》，便成為在臺灣的日本知識分子和臺灣地方人士記錄臺灣地方文化的園地，[73]這其中也包括島內不同民族的文化。而文中提到的「大東亞戰爭」於 1941 年底爆發，日本對英美等西方國家正式宣戰，其宣傳口號之一便是建立以日本為核心的「大東亞共榮圈」。這一說法的提出，約在 1940 年中期，隨著日本對重要原料進口地的東南亞政策確立而逐漸形成，它強調東南亞在地理、歷史、人種、經濟上的密切聯繫，試圖將各種族納入一個以日本為核心的共存共榮局面。[74]同時，日本政府也開始進行「南方圈調查」，其中一主要項目便是進行華僑及其商業的研究，

72 有元剛，〈卷頭一言〉，收入羅香林著，有元剛譯，《客家研究導論》（臺北：臺灣銀行，1942）。

73 吳密察，〈《民俗臺灣》發刊的時代背景及其性質〉，收入石婉舜、柳書琴、許佩賢編，《帝國裡的「地方文化」——皇民化時期臺灣文化狀況》（臺北：播種者出版有限公司，2008），頁 49-81。

74 W. G. Beasley, *Japanese Imperialism, 1894-1945*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7), pp. 224-23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可以看出，日本人翻譯《客家研究導論》一書的目的，其實是為了使國民了解「南支」（華南）、南洋（東南亞）的情況。文中也暗示，了解居住於臺灣的這些客家人，將更有利於統合南洋客家群體。由此，這一為了召喚東南亞客家人民族主義的文本，反而成為支持日本殖民政府大東亞共榮圈新政策的宣傳品。

由於短短幾年後，日本帝國便崩潰了，其宣傳的效果可能相對有限。但同一時期，除了那些被日本殖民政府徵調到中國大陸及東南亞地區的臺籍日本兵外，為了躲避徵召、經商、求學乃至求官等理由，在中國大陸活躍的臺灣人並不少。在各種政治勢力角逐的複雜政治環境中，臺籍客家菁英與中國大陸客家意識的流布渠道也有了更多的接觸，親日的南京國民政府便是一個重要的平臺。北部苗栗著名的作家吳濁流，其小說中提到的客家人常反覆被學者們引用。在他的自傳性小說《臺灣連翹》中，曾這樣描述：

> 我一到南京，就投宿在同學章君的家裏。章君自稱廣東客家，在汪偽政權的宣傳部服務。他一見到我，就特別囑咐我，千萬不能表明自己是臺灣人……。
>
> 我也曾經和陳公博這個人見過面。當時陳公博是上海市長，在重慶擔任實業部長。我是在「旅京客家會」上跟他見面的，因為他和我一樣是客家人，所以對他有特別的好感。[76]

可以看出在當時複雜的政治環境下，這些在中國的臺灣殖民地知識分子掩飾殖民地子民身分，而選擇強調「客家」身分。文中提到的「章君」，即臺灣南部六堆中的先鋒堆萬巒鄉人鍾壬壽（1902-1979），吳、鍾二人曾是臺北國語學校的同學。[77]鍾壬壽約在 1938 年底 1939 年初進入維新

頁 161。

76 吳濁流，《臺灣連翹》（Irvine, Calif.：臺灣出版社，1987），頁 84、91。

77 吳濁流在自傳性小說《無花果》中，對他與鍾壬壽兩人自臺灣總督府國語師範學校時代開始的關係有這樣的描寫：「同是二年級的某一天，和特別相好的章君一起從農園歸來的途中，章君滑了一跤，脫臼了。送到臺北醫院接骨，經過四五天，我看到指尖還一點也不會動，真驚住了。我的家，世世代代都為人接骨，從小就常有見聞。……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政府任職，1940 年進入汪精衛南京政府，因精通日語，仕途一帆風順，歷任宣傳部參事、安徽省建設廳廳長等職。[78]至於陳公博（1892-1946），其自傳則稱原為福建上杭人，後遷乳源，祖父輩時才遷至廣州。[79]「旅京客家會」很可能也是帶有客家意識的菁英們的聚會，吳、陳二人就是在這一場合相識。

當然，這些都是戰後回憶中留下的表述，1940 年代的吳濁流和鍾壬壽是否即已自稱「客家」，我們無從知曉，不過這些有中國大陸經驗的客家知識階層，更容易受到日益高漲的客家意識刺激，這樣的經驗無疑影響日後他們對自身認同的看法。他們和更早一批赴大陸發展的臺灣客家菁英們，構成了銜接中國大陸伴隨近代民族主義發展興起的中原客家意識，與臺灣本地十九世紀下半葉以來「客家」意識和經驗的主力。

六、民族國家內客家觀念的散播

十九世紀後期至日本殖民政府半個世紀的統治，已經為臺灣「泛臺灣客家認同」搭好了基臺，戰爭末期政治局勢的發展，也為其轉換為「客家」這個標籤稍啟一隙，至戰後國民政府接收臺灣，無論戰前的政治立場如何，臺灣的知識分子都必須面對民族國家意識形態的主流。即使是日治後期傾向於支持皇民化、且極少主動彰顯其「廣東種族」身分的客籍知識菁英們，也開始談論「客家族」和民族主義的關係了。[80]那些在廣東地方政治中崛起的客家人，包括一些回流的「半山」，戰後紛紛來

把他帶到我家去治療，之後，兩人更為親密，後來竟成為我去大陸的原因。我四十二歲時到大陸去，完全是因為當時他在南京的緣故。」吳濁流，《無花果》（臺北：前衛出版社，1988），頁 68-69。

78 鍾壬壽，〈主編自介〉，《六堆客家鄉土誌》，頁 695-696。

79 陳公博，《寒風集》（上海：地方行政社，1944），頁甲 4。

80 龍瑛宗，〈民族主義の烽火〉，《新青年》第 1 卷第 3 期（1945 年 11 月 10 日）；轉引自氏著，《龍瑛宗全集（日本語版）》第五冊（臺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08），頁 17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進入政府部門、軍隊、學校等機構任職。他們對於中原客家學說的流佈，更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體現這一潮流的最佳例證，便是戰後南北客家地區地方志中，對於羅香林客家學說的宣揚。[81]中華民國整個國家機器遷臺之後的 1950-1960 年代，臺灣北部及南部客家聚居地區均著手編修地方志。較早出版的《新竹縣志稿・人民志》（1957），由祖籍泉州的閩籍知識分子黃旺成所編，其中羅香林客家學說的影響還不明顯。[82]而其他幾本由客家人主修的志書，均以不少篇幅描述羅香林所勾畫的、客家人作為中原移民的「前史」，1967 年修成的《苗栗縣志・語言篇》便是一例：

> 客家人民遷入本縣，其時間較閩南移民稍晚。先是，在五胡亂華之時，中原世家望族，相率南遷，……及清代海禁大開，廣東蕉嶺、梅縣、陸豐、饒平，一帶客家，因離海較近，遂相率來臺，遷入於本縣，其時間以乾嘉之世為最多。[83]

該篇章的編修者是廣東梅縣人黃基正，當時在苗栗縣政府任職。

在南部地區，從 1953 年至 1971 年才陸續編成的《屏東縣志》，不但講述客家族群早期由中原移民的歷史，更重要的是他們在該縣拓墾史上的領先地位，「漢族中之『客族』」，普通稱為『客家』，實為本縣移墾最早者」。[84]該志編纂者，初期為曾參加東寧學會的六堆人鍾桂蘭，1930 年代他便赴中國大陸工作，戰後才返回臺灣。1960 年後編纂工作則

---

81 早在 1930 年代，羅香林有關客家的理念，便通過他參與編修民國《廣東通志》而在官方史書中留下位置。戰後羅香林轉赴香港任職，但仍和在臺的中華民國政府保持密切關係。程美寶，〈羅香林與客家研究〉，《客家研究輯刊》第 1 期（總第 32 期）（2008，梅州），頁 29-32。

82 黃旺成纂修，《臺灣省新竹縣志稿》（新竹：新竹縣文獻委員會，1957），卷 4，〈人民志〉，頁 29。

83 黃基正，《苗栗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據 1959-1978 年排印本影印），卷 2，〈人文志・語言篇〉，重編頁 1189-1190。

84 鍾桂蘭、古福祥纂修，《屏東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據 1954-1971 年修輯之《屏東縣志稿》及排印本《屏東縣志》整理合編影印），卷 2，〈人民志〉，重編頁 796、79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由大陸來臺的客家人古福祥主持。正是由客家人主導縣志編修，以致該書中處處流露出「客家中心主義」，客家人彷彿成了縣史的歷史敘述主角。

戰後中國大陸客家研究傳統與臺灣社會結合的第二個表現，是客家話研究的再次興盛，並形成了第二波客語標準化。由於近代以來，客家研究者紛紛從客家方言中找尋中原古音，用以證明客家人是中原漢人的後裔，臺灣的客語研究也匯入這一潮流，不少地方人士紛紛藉編修地方志的機會，對客家話進行研究。

在北部，由周法高編修的《桃園縣志．語言篇》（1964）及黃基正編修的《苗栗縣志．語言篇》，用注音符號標出客家話的音標。尤其是後者，一方面一脈相承大陸語言學研究傳統，另一方面也對縣內語言分布情況進行詳細調查，可說是對臺灣客家語音語言最早的詳盡紀錄。[85]而南部《屏東縣志．語言篇》的編修者鍾桂蘭，早在日治中期便接觸中國大陸客家方言研究的潮流。[86]他在志書中所列客家語言學者的學術系譜中，第一位便是常被視為客家論述起點的徐旭曾，及其後民國諸多學者、歐美人士，臺北第二師範學校教師菅向榮（曾著《標準廣東語典》）也躋身其中。更重要的是，他將日本時代的「廣東族」全部以括號註釋的方式解釋為「客家」，從而將日本殖民時代的分類方式與客家觀念混同起來了。[87]《高雄縣志稿》的作者，雖然了解日治時期客家話「四縣」與「海陸」的分類，「惟素無調查，頗難詳細譜列」，乾脆將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中的語言部分直接照搬過來，更是將兩個傳統融合起來的絕佳例證。[88]

85 周法高纂修，《桃園縣志》（桃園：桃園縣文獻委員會，1964），卷 2，〈人民志．語言篇〉；黃基正，《苗栗縣志》，卷 2，〈人文志．語言篇〉。

86 鍾桂蘭從日本畢業後，1922 年曾到南京、江浙一帶遊覽，住在上海廣東同鄉會，陪同當時在廣東省政府任職的古直，攜帶黃遵憲編的《客家方言》一書去訪問著名的學者章太炎。鍾桂蘭、古福祥纂修，《屏東縣志》，卷 2，〈人民志〉，重編頁 834。

87 鍾桂蘭、古福祥纂修，《屏東縣志》，卷 2，〈人民志〉，重編頁 825-835。

88 根據橋本萬太郎的研究，羅香林對於語言研究亦非專家，他對興寧話的考察實際上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原客家的標籤，也逐漸為戰後臺灣地方社會客家人的組織所接受。在臺北活躍的南部六堆和北部桃竹苗客家人，戰後初期即成立了一個社團，最初仍是以臺灣社會常用的稱呼「客人」來命名，「第 1 屆客人會席開 20 桌。此後，每年正月召開一次，後來改名客家會」。[89]到 1964 年，在高雄成立的六堆客家人同鄉會組織，更叫作「中原客家聯誼會」。據後來追溯的記載：

> 與會鄉親一致主張高雄市已有數萬客家鄉親居住，有的已數年，甚至數十年，如今沒有一個類似同鄉會性質的組織來作聯誼，十分寂寞，因此不計頭銜如何，勢在必行，乃藉已成立多年的臺北市中原客家聯誼會作為借鏡，嗣經徐富興博士提議仿照臺北成立同名的「高雄市中原客家聯誼會」，凡屬客家鄉親不論其行政區域為何，均可參加入會。[90]

「中原」一稱強調的是羅香林以降客家族源的敘事，也就是和中華民族發源地的聯繫，臺灣地方社會的客家人也透過這一方式，與想像的中原正統聯結起來。據說該會模仿北部「中原客家聯誼會」的組織和名稱，推舉的領袖是徐富興，這並不難理解，因為北部客人會的「靈魂人物」徐傍興，即為其兄長。徐傍興在日治時期即獲醫學博士學位，戰後在北部開業，「因為徐傍興熱心會務，出錢出力，致有人以為徐醫師為客家會的創會會長」。[91] 1971 年香港客家人的社團崇正總會（1921 年成立，戰後政治上傾向於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的紀念特刊中，已經出現「臺

賴的是 1928 年語言學家王力對廣西客家語言的敘述。《高雄縣志》的作者看來是在缺乏調查情況下的權宜之計。謝問岑修，陳子波纂，《高雄縣志稿》（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據高雄縣文獻委員會 1958-68 年排印本影印），卷 2，〈人民志〉，原頁 111，重編頁 347；Mantaro J. Hashimoto, *The Hakka Dialect; A Linguistic Study of Its Phonology, Syntax, and Lexicon*, pp. 26-27.

89 葉倫會編著，《真情實話：溫送珍訪談錄》（臺北：蘭臺出版社，2007），頁 37。

90 財團法人高雄市客家文化事務基金會編，《高雄市客家人文史之研究》（高雄：財團法人高雄市客家文化事務基金會，2003），頁 108。

91 葉倫會編著，《真情實話：溫送珍訪談錄》，頁 3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北市中原客家聯誼會」、「高雄市中原客家聯誼會」兩個組織，並詳細列出成員名單。[92]

這樣一種發展背後，與臺灣戰後政治環境發展的需要脫離不了關係。這些地方社會的客家社團，無論實際囊括哪些群體，帶有何種利益考量和政治盤算，都不可避免要被捲入 1960-1970 年代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呼籲人民團結的政治需求當中。在南北都市活躍的中原客家聯誼會組織，也曾積極參與地方選舉與聯絡僑胞活動等。[93]

1971 年，本應為歡欣鼓舞的建國六十周年，卻因中華民國政府被迫退出聯合國的重大外交挫折，對整個臺灣社會造成極為強烈的心理震盪。在此之前，臺灣社會各種議論便已經紛擾不斷。在這一背景下，在政治和外交上聯絡華僑的呼聲益發迫切，一個更大範圍的客家建構活動勢頭遂逐漸形成。1971 年 9 月在香港舉辦的世界客屬懇親大會，便是其最高潮。當時的記載稱：「五大洲全世界四十九個國家地區客屬團體均推代表及觀察員，蒞港祝賀並出席世界客屬懇親代表大會。」[94]彼時擔任香港崇正總會會長、1949 年後居於香港的前陸軍上將張發奎會長獻詞稱：

> 本會會員，數以百萬計，且遍及全球，無遠弗屆，在世界各國重要地區多有本會組織。以之發揚吾國固有美德，對於世界正在滋長之敗行頹風，當可對症下藥，大有貢獻；以之宣揚國策，發動國民外交，對於國際政治逆流中之現實主義者、強權主義者及市儈主義者，當能予以當頭棒喝，驚醒其迷夢，而有助於我國外交局勢之打開。[95]

92 〈香港崇正總會世界客屬懇親大會、金禧慶典、大廈落成專輯〉，收入崇正總會金禧紀念特刊編輯委員會編，《香港崇正總會金禧紀念特刊》（香港：崇正總會金禧紀念特刊編輯委員會，1971），頁 27-28。

93 〈海外客屬團體概況〉，收入崇正總會金禧紀念特刊編輯委員會編，《香港崇正總會金禧紀念特刊》，頁 20-23。

94 〈香港崇正總會世界客屬懇親大會、金禧慶典、大廈落成專輯〉，收入崇正總會金禧紀念特刊編輯委員會編，《香港崇正總會金禧紀念特刊》，頁 9。

95 張發奎，〈本會金禧大慶獻詞〉，收入崇正總會金禧紀念特刊編輯委員會編，《香港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香港、臺灣、東南亞以及世界各地客家人本來有各自的組織，可能並不存在實質的聯繫，現在他們都被納入「世界客家」的範疇之中，從而為陷入外交困局的中華民國政府尋求到另一種支持途徑。臺灣社會的「泛臺灣客家認同」，也就在民族國家的強烈需求之下，接受「客家」這個新標籤，融匯到中原客家的主流之中。

兩年之後（1973），臺灣第一部標榜「客家」認同的地方史志——南部地區的《六堆客家鄉土志》出版。同樣的，羅香林的客家觀念成為全書的首重，該書的第一部分，正是鍾秉光根據羅香林觀念改寫的《客家源流考》。不過更重要的是其背後的主導者，正是那些日治時代積聚起來的地方菁英們，編纂者鍾壬壽曾在南京汪精衛政府為官，戰後背負漢奸的心理重擔回臺，卻因精通「國語」，很快在臺北站穩腳跟，曾出任工業會總幹事。[96]而幕後的經費支持者，則是戰前曾組織六堆旅北同鄉會，戰後任臺北市中原客家聯誼會副會長，亦曾參加 1971 年世界客屬懇親大會的徐傍興。他們接受了客家的身分認同，也試圖將這一認同轉化為整個地方社會的認同。

至 1978 年，戰後第一本客家研究專著，由苗栗人陳運棟所著的《客家人》出版，成為戰後臺灣各地客家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他接受羅香林範式的影響，也將臺灣的客家人視為一個有特殊語言、民性和風俗習慣的民系，但在統計臺灣客家人口時，則只是在日治時代漢民族調查中的廣東省嘉應州、惠州府、潮州府人口外，另外併入了福建省汀州府人口，顯示出「客家」觀念與日治時代「廣東種族」觀念之妥協。[97]

該書的流布，成為「泛臺灣客家認同」逐漸滲入臺灣底層社會的表現。正如作者在十年後曾言：「自民國六十七年九月，《客家人》出版以來，想不到很快地成為暢銷書，市面上時而絕版，時而各種版本同時

崇正總會金禧紀念特刊》，頁 1。

96 鍾任壽（鍾壬壽）著，鍾孝上譯，《友善抗日七十年——盼望君子國日本之再建》（自印本，原著 1975，中譯本 1995），頁 152-198。

97 陳運棟，《客家人》（臺北：聯亞出版社，1980），頁 1、11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出籠。」[98]此恰恰是在客家運動興起之前，臺灣社會客家意識醞釀與傳播情形的一個縮影。

七、結論

近年來，臺灣社會內對於客家族群的關注，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學術上，都呈現出蓬勃發展之勢。社會學家王甫昌等學者一針見血地指出它和 1980 年代以來臺灣社會政治演變的關係，而 1980 年代以前臺灣客家人的歷史經驗，他則籠統稱之為「泛臺灣客家認同」。這種解釋模式，強調了知識型的斷裂，將清帝國以降不同階段的歷史發展化約成「傳統」，並成為當今族群運動可以功利性運用的素材。但是，這一「傳統」內部，卻包含著不同階段與層次的歷史演變，從前近代的人群分類到近代族群意義上的「客家」意識的傳播，便是這一「傳統」洪流內旁逸斜出的支流。

在這一點上，學者們對於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上半葉，近代客家族群現象與中國社會演變關係的討論，對我們頗有啟示。梁肇庭與程美寶的研究顯示，近代中國革命的歷史，也是大陸廣東地區客家人在近代政治舞臺地位日益重要的歷史，客家人對於作為廣東一個合法民族支派的追求，與在新的政治秩序中佔有一席之地的努力，可謂並行不悖。[99]陳永海則強調近代民族主義與新媒體等，對於建立客家族群這一想像群體的關鍵作用。客家觀念的衍生是一個近代的現象，將其族群起源與明清以來的歷史相提並論，同樣是後來產生的意識向歷史的投射。[100]

---

98 陳運棟，《臺灣的客家人》（臺北：豐原出版社，1989），頁 11。

99 Leong Sow-Theng, *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Chinese History: Hakkas, Pengmin, and Their Neighbors*, pp. 83-88; 程美寶，《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清末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頁 251-259。

100 陳永海，〈作為中國國族事業的客家言說——從香港看近代客家文化認同性質的變遷〉，收入劉義章編著，《香港客家》，頁 25-4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本文試圖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追溯「客家」族群觀念如何在臺灣衍生和流變的歷史，以便為臺灣客家族群的討論注入更為豐富的歷史內涵。這並不是說，清初以來這些「客家人」的祖先百餘年間的歷史建構不重要，但清王朝下有關「客」的人群分類，往往與今日族群意義上的客家無關。從人種學意義上「發現」臺灣客家人的，是十九世紀下半葉臺灣開港之後湧入的西方人。廣府話群體對客家話群體的稱呼 Hakkas（客家），經過英文轉譯，透過西方人的媒介，與臺灣講客家話方言的群體連結在一起（有時也只是含混地取代粵人）。詞彙上的微妙變化，顯示出一個與南中國廣闊地域聯為一體的客家想像，也影響了 1895 年接收臺灣的日本殖民政府。他們一方面接受西方的種族觀念，另一方面則摒棄與殖民地政治話語無關的血統討論，而直接用籍貫的稱呼「廣東種族」取代其曾一度認知的「客家」。這一作法表面上延續清廷以籍貫區分人群的方式，實際上則是用籍貫的名稱固定其種族身分。

日治時代五十年的國家建構，對於臺灣社會客家族群想像的形成，有著深遠的影響。日本殖民政府在臺灣進行大規模的人口普查和登記，將殖民地人民的種族身分固定下來。臺灣南北地區「廣東種族」內部涵蓋人群存在的差異，反映了之前清帝國時期不同地域人群分類與統合的不同樣貌。但在殖民地範圍這個統一標籤之下，這些樣貌開始被勾勒得越來越清晰和近似。日本知識分子透過文化創造，明晰其種族語言、文化、風俗習慣等特性，從而讓客家群體（儘管當時名稱叫作「廣東種族」）在臺灣社會凸顯出來，成為獨特的族群，成為「泛臺灣客家認同」歷史基礎的一部分。

不過，「泛臺灣客家認同」的建構，並不意味著臺灣成為一個抗拒外部影響的「絕緣體」，相反的，受中國大陸民族主義影響的客家族群建構，以及日本帝國意識形態改變下的族群想像，無不影響著臺灣社會日治時期新興知識階層的意識。日治時期不少客家菁英奔赴中國大陸及日本，尋求接受高等教育及工作機會，同時也受到在這兩個不同環境發展的民族主義的刺激，甚至投身廣東革命策源地，參與到客家人政治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力上升的潮流，在戰後，他們都成為推動地方社會客家意識散播的主力。而生活在殖民體制下的客家菁英，在近代國家建構中，也有更多機會走出鄉村，利用語言和鄉貫意識凝聚成小的團體，其經濟與政治上的抱負也逐漸醞釀升溫。

從日治末期羅香林中原客家學說的引進，我們也可以看出民族主義和殖民主義交互影響的態勢。羅香林的客家學說無疑深受民族主義的影響，日本人則是在 1940 年代之後的戰爭時期，在帝國版圖日益擴張的情況下，新的政治語言和意識形態「大東亞共榮圈」興起，才翻譯其書引入臺灣。可以說，在臺灣客家族群的塑造上，民族主義和殖民主義呈現出不斷交互影響的態勢。

至戰後，日本殖民帝國崩塌，中華民國的整個國家機器隨即架設到臺灣，臺灣的「廣東種族」與再次進入臺灣的「客家」新標籤開始合流。羅香林的中原客家觀念，與民族國家意識形態同步，也在臺灣地方社會持續升溫，無論是戰前便受到客家自覺意識影響的臺籍知識階層，還是在日治時期建立穩固基礎的地方菁英，均樂於借用這一理論，強調客屬族群與民族國家的關係，也成為他們聯絡同好、創造利益，以及重塑與延續地方社會傳統的方式。中華民國政府也樂於推動客家意識的建構，因為它與民族主義洪流並行不悖，同時可以在更大的範圍內聯絡和統合華僑，為外交上的窘境打開出路。

透過上述的討論可以看出，「客家」族群觀念在臺灣社會並不完全是新興的，從十九世紀下半葉開始，西方、日本以及中國的知識階層們便試圖認知和想像他們，臺灣的知識階層受到影響，對於這一觀念也並不陌生。當然，知識階層菁英的想法要轉化成全民的客家意識，還有一段距離。在本文討論時間截止的 1980 年代，到筆者於田野調查時普遍聽到當地人自稱「我們客家人」的這二十餘年間，正是臺灣社會結構轉型、客家自我意識蓬勃發展的時代，也是客家族群認同發生質變的時代，王甫昌的研究便敏銳地指出這一點。筆者要強調的，則是在此之前「泛臺灣客家認同」的形塑過程，它和 1980 年代以後的文化範式有斷裂，也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連續，本文梳理的是存在其中的連續部分。只有明白這一知識型的轉換，才能理解二十世紀後期臺灣社會客家族群的想像並不是憑空產生的。

*本文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第五輪卓越學科領域計畫「中國社會的歷史人類學研究」的資助，修改工作則在新竹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完成，特此致謝。本文在寫作過程當中，得到不少師友和機構的幫助，林欣宜、費德廉（Douglas Fix）、林炳炎、曾令毅及楊韻平等師友，曾協助調查或惠賜資料，靜宜大學臺灣文學系及臺灣文學資源中心亦提供館藏以供參考，謹致上深深謝意。林欣宜和費德廉教授曾仔細閱讀本文初稿並提出修改意見，匿名評審人及學報編輯委員會亦給予細緻中肯的批評意見，對本文之修改有極大幫助，謹在此一併致謝。惟文中若有任何錯誤或不當之處，文責自負。

（責任編輯：蘇聖雄　校對：劉昱妤　蘇婉婷）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文獻史料

〈國勢調查辯疑〉，《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5 年 7 月 12 日，第 2 版。
自立晚報新竹區分社編，《新竹、桃園、苗栗三縣人士志》。新竹：自立晚報新竹區分社，1952。
王元穉編，《甲戌公牘鈔存》。臺北：臺灣銀行，1959。
丘念台述著，《嶺海微飆》。臺北：中華日報社，1962。
申子佳、鄭美倫編著，《吳伯雄前傳》。臺北：開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4。
石敢當，〈廣東省の民族〉，《臺灣時報》，1938 年 11 月，臺北。
宋文炳著，小口五郎譯，《支那民族史》，附錄〈廣東客家民族の研究〉。東京：大東出版社，1940。
吳濁流，《臺灣連翹》。Irvine, Calif.：臺灣出版社，1987。
吳濁流，《無花果》。臺北：前衛出版社，1988。
周法高纂修，《桃園縣志》。桃園：桃園縣文獻委員會，1964。
邱金田，《七十年回顧——由農村生活邁進工業社會的歷程》。麟洛：自印本，1982。
崇正總會金禧紀念特刊編輯委員會編，《香港崇正總會金禧紀念特刊》。香港：崇正總會金禧紀念特刊編輯委員會，1971。
陳公博，《寒風集》。上海：地方行政社，1944。
陳國政編，《李添春教授回憶錄》。臺北：冠芳印刷，1984。
陳朝海編，《普寧樂善堂陳家族譜》。出版地、出版者不詳，1972。
陳朝海，《陳球公行狀》。臺北：陳朝海、陳馬岱、陳延慶印，1975。
陳運棟編纂，《重修苗栗縣志》。苗栗：苗栗縣政府，2006。
管向榮，《標準廣東語典》。臺北：古亭書屋，1974 據 1933 年版影印。
黃旺成纂修，《臺灣省新竹縣志稿》。新竹：新竹縣文獻委員會，1957。
黃基正，《苗栗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據 1959-1978 年排印本影印。
黃麗霞等編輯，《戀戀庄情事——萬巒人的老照片》。屏東：藍色東港溪保育協會，1999。
葉倫會編著，《真情實話：溫送珍訪談錄》。臺北：蘭臺出版社，2007。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臺南縣公文類纂》，內務門庶務部，明治 30 年（1897），卷 9726。
臺南縣廳編纂，《臺南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 據臺南縣明治 32 年（1899）版影印。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臺灣總督府檔案中譯本》，第 5 輯，明治 28 年（1895）。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5。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臺灣總督府檔案中譯本》，第 11 輯，明治 29 年（1896）。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慣習研究會原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譯編，《臺灣慣習記事》（中譯本）第壹、貳、五卷。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4-199。日文版：《臺灣慣習記事》第一卷第一號、第二卷第七號、第五卷第十二號，1901-1905，臺北。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大正十四年國勢調查結果表》。臺北：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1927。

臺灣總督府，《廣東語辭典》。臺北：臺灣總督府，1932。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明治 28 年（1895）。

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臺北：臺灣時報發行所，1928。

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編，《臺灣現住人口統計》，昭和元年（1926）。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1927。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原編，林書揚等編輯，王乃信等譯，《臺灣社會運動史（一九一三年－一九三六年）》，第四冊。臺北：創造出版社，1989。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臺北：南天書局，1995。

劉克明，《廣東語集成》。臺北：新高堂發行，1919。

潤庵生，〈南清遊覽紀錄（五）〉，《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 年 1 月 21 日，第 1 版。

龍瑛宗，《龍瑛宗全集》（日本語版）第五冊。臺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08。

劉燕夫編，《劉兼善先生八秩大慶祝壽冊》。臺北市：編者，1980。

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部編，《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集計原表》，第 1 冊，全島之部，明治 38 年（1905）。臺北：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部，1907。

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部編，《臨時臺灣漢譯戶口調查記述報文》，明治 38 年（1905）。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統計課，1909。

謝問岑修，陳子波纂，《高雄縣志稿》。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據高雄縣文獻委員會 1958-68 年排印本影印。

鍾桂蘭、古福祥纂修，《屏東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據 1954-1971 年修輯之《屏東縣志稿》及排印本《屏東縣志》整理合編影印。

鍾壬壽纂修，《六堆客家鄉土誌》。屏東：常青出版社，1973。

鍾任壽（鍾壬壽）著，鍾孝上譯，《友善抗日七十年——盼望君子國日本之再建》。自印本，原著 1975，中譯本 1995。

鍾獨佛，《粵省民族考原》。香港：方樹福堂，1989 據民國 10 年（1921）卷密精廬石刻本影印。

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臺北：南天書局，1992 據 1933 年廣州初版影印。

羅香林著，有元剛譯，《客家研究導論》。臺北：臺灣銀行，1942。

〔日〕丸井圭治郎，《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臺北：捷幼出版社，1993 據臺灣總督府大正 8 年（1919）版影印。

〔日〕小川琢治，《臺灣諸島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 據明治 29 年（1896）東京地學協會版影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日〕小熊英二，《單一民族神話の起源：日本人の自畫像の系譜》。東京：新曜社，1995。
〔日〕井出季和太著，郭輝編譯，《日據下之臺政》。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3。
〔日〕田村壽原、濱田恒一著，張蔭桐譯述，《南洋華僑與經濟之現勢》。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
〔日〕竹越與三郎，《臺灣統治志》。臺北：南天書局，1997 據 1905 東京博文館版影印。
〔日〕志波吉太郎，《廣東語會話篇》。臺北：臺灣日日新聞社，1915。
〔日〕岡田東寧，《臺灣歷史考》。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據明治 30 年（1897）東京拓殖務省文書課本影印。
〔日〕河野登喜壽編，《廣東語の研究》。新竹：新竹州警察文庫，1933。
〔日〕增田福太郎，《臺灣の宗教，附臺灣本島人の宗教》。臺北：南天書局，1996 據昭和 10 年（1935）東京養賢堂版影印。
〔日〕藤村源泰郎、岡野才太郎，《漢文戶口要鑑》。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06。
〔日〕藤崎濟之助著，全國日本經濟學會譯，《臺灣史與樺山大將——日本侵臺始末》。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3。
〔英〕必麒麟（W. A. Pickering）著，吳明遠譯，《老臺灣》。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德〕ルードウィヒ・リース（Ludwig Riess），吉國藤吉譯，《臺灣島史》。東京：富山房，1898。
Davidson, James W.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History, People, Resources, and Commercial Prospects: Tea, Camphor, Sugar, Gold, Coal, Sulphur, Economical Plants, and Other Produc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Macmillan & Co.; Yokohama [etc.] Kelly & Walsh, ld.1903.
Gutzlaff, Charles.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 Religion,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Rev. Andrew Reed.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
Horn, James. “Extract form Journey.” *The China Mail*, Dec. 12, 1867, Hong Kong.
Möllendorff, P. G. von. “On the Foreign Languages Spoken in China and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Chinese Dialects.” *China Mission Hand-Book* Vol.1, 1896, Shanghai.
Pickering, W. A. *Pioneering in Formosa: Recollections of Adventures among Mandarins, Wreckers, & Head-hunting Savages: with an Appendix on British Policy and Interests in China and the Far East.* London: Hurst & Blackett. 1898.
Swinhoe, Robert. “Additional Notes on Formosa.”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10:3, 1865-1866, London.

二、近人著作

王甫昌，《當代臺灣社會的族群想像》。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3。
白尚德，《十九世紀歐洲人在臺灣》。臺北：南天書局，199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吳中杰，〈義民信仰與北臺灣客語分佈格局的形成〉，收入賴澤涵、傅寶玉主編，《義民信仰與客家社會》。臺北：南天書局，2006。
吳中杰，〈屏東市林仔內的揭陽河婆客家話：兼論海陸客語聲調類型的起源〉，收入高雄師大客家文化研究所編，《客家社會與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津出版社，2007。
吳密察，《臺灣近代史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1991。
吳密察，〈臺灣史的成立及其課題〉，《當代》第 100 期，1994，臺北。
吳密察，〈《民俗臺灣》發刊的時代背景及其性質〉，收入石婉舜、柳書琴、許佩賢編，《帝國裡的「地方文化」——皇民化時期臺灣文化狀況》。臺北：播種者出版有限公司，2008。
李文良，《清代南臺灣的移墾與「客家」社會（1680-179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
林正慧，《六堆客家與清代屏東平原》。臺北：曹永和文教基金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
邱彥貴，〈三山國王信仰：一個臺灣研究者的當下體認〉，《客家研究輯刊》第 2 期（總第 33 期），2008，梅州，頁 49-54。
邱湘雲，〈海陸客家話和閩南語構詞對比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5。
施添福，〈從「客家」到客家（二）：客家稱謂的出現、傳播與蛻變〉，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第三屆「族群、歷史與地域社會」學術研討會專題演講論文。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主辦，2011。
財團法人高雄市客家文化事務基金會編，《高雄市客家人文史之研究》。高雄：財團法人高雄市客家文化事務基金會，2003。
徐貴榮，〈台灣饒平客話音韻的源與變〉。新竹：新竹教育大學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
陳永海，〈作為中國國族事業的客家言說——從香港看近代客家文化認同性質的變遷〉，收入劉義章編著，《香港客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陳政三，《翱翔福爾摩沙：英國外交官郇和晚清臺灣紀行》。臺北：臺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2008。
陳春聲，〈三山國王信仰與臺灣移民社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80 期，1996，臺北，頁 61-114。
陳運棟，《客家人》。臺北：聯亞出版社，1980。
陳運棟，《臺灣的客家人》。臺北：豐原出版社，1989。
程美寶，《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清末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北京：三聯書店，2006。
程美寶，〈羅香林與客家研究〉，《客家研究輯刊》第 1 期（總第 32 期），2008，梅州。
費德廉（Douglas Fix）著，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臺灣：十四位西方旅行者的福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摩沙故事》。臺北：如果出版社，2006。
楊建成主編，《三十年代南洋華僑團體調查報告書》。臺北：中華學術院南洋研究所，1984。
劉鎮發，〈客家人的分佈與客語的分類〉，收入李如龍、周日健主編，《客家方言研究：第二屆客家方言研討會論文集》。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8。
羅烈師，〈臺灣客家之形成：以竹塹地區為核心的觀察〉。新竹：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5。
羅濟立，〈統治初期日本人之臺灣客語學習——「廣東語」『臺灣土語叢誌』的成立及其音韻表記、語彙〉，《東吳外語學報》23 期，2006，臺北，頁 87-123。
羅濟立，〈日本統治初期之客語假名遣考——以「廣東語」『臺灣土語叢誌』的同字異注為例〉，《東吳外語學報》24 期，2007，臺北，頁 65-100。
〔日〕飯島典子，〈19 世紀傳教士眼中的「客家人」〉，《客家與多元文化》第 4 期，2008，東京，頁 29-37。
Beasley, W. G. *Japanese Imperialism, 1894-1945.*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7.
Cohen, Myron L. “The Hakka or ‘Guest People’: Dialect as a Sociocultural Variable in Southeastern China.” *Ethnohistory* 15:3, 1968, Durham.
Eskildsen, Robert, ed. *Foreign Adventurers and The Aborigines of Southern Taiwan, 1867-1874: Western Sources Related to Japan’s 1874 Expedition to Taiwan.* Taipei: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2005.
Hashimoto, Mantaro J. （橋本萬太郎） *The Hakka Dialect; A Linguistic Study of Its Phonology, Syntax, and Lexic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Leong, Sow-Theng. *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Chinese History: Hakkas, Pengmin, and Their Neighbor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istorical Inquiry 48 (Dec. 2011), pp. 1-49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Rethinking the pan-Hakka Identity of Taiwan: The Construction of Hakka Ethnicity on Taiwan from the 1860s to the 1980s

Chen, Li-hua*

Abstract

The rising "Hakka" identity in the Taiwan society has been an increasingly noticeable phenomenon since the late 1980s. Social scientists have analyzed specific social movements that contribut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Hakka identity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Yet, the present article contends that the introduction, mutation, and evolution of "Hakka" concept by westerners, local elites as well as different regimes on Taiwan from the 1860s to the 1980s provided this on-going construction with historical foundation.

Investigating the roots of Hakka ethnicity on Taiwan since the second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author finds that the concept of "Hakka" was a transplant introduced to Taiwan since the 1860s by westerners who had been influenced by the prevailing notions of race. Although the usage of "Hakka" continued to gain dominance even during early Japanese rule on Taiwan, colonial officials adopted "Guangdong (yue)" in place of "Hakka" as a category for ethnic classification in population censuses and language surveys. However, a pan-Hakka identity, which included non-Hakka speaking people from Guangdong and non-Guangdong origin but Hakka speaking people, has been flourishing because of the grafting effects through the use of cultural symbols representing Hakka ethnicity.

* Postdoctoral fellow,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of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No. 101, Section 2, Kuang-Fu Road, Hsinchu, Taiwan 30013, R.O.C.;
E-mail: lhchen101@gmail.co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s soon as the government of Republic of China retreated to Taiwan in 1949, their “Hakka” conception, which sprouted with the growing nationalism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and many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merged with the local Hakka identity that thrived in the war-time colonial milieu and had ultimately molded a strong Hakka identity among many local “Hakka” intellectuals. The Hakka elite’s propagation of Hakka identity, echoing the state-building appeal of post-war Chinese regime on Taiwan, eventually constructed a solid historical foundation that allowed the mushrooming of Hakka identity in Taiwan society since the late 1980s.

Keywords: Taiwan, Hakka, pan-Hakka identity of Taiwan, ethnicity, intellectual cla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